

# 尤里节\*



文/〔俄罗斯〕尤里·阿拉鲍夫

译/ 罗 佼

音乐学院的演出厅

一位个子不高的中年女子身穿端庄的黑色长裙站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小剧院的舞台上，在合唱团的伴唱下演唱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的《晚祷》：

我心称颂上帝，  
颂主美名，  
上帝我主，  
无上尊荣……

她在演唱的时候通常会盯着某一位观众的脸。这是一个危险的举动，因为如果这个人打哈欠或者面露嫌色，会令演唱者难堪、扫兴，影响抒情情绪。音乐学院的声乐老师向来建议演唱者在舞台上不要注视某个人，而是从大厅里选择一个别人注意不到的点，一个非人的、像莫斯科的阴天一样模糊阴沉的点，对着这个点倾洒歌唱的激情、热烈的辞藻。但是她对此不以为然，因为她是为人们而歌唱，而不是为一个模糊的点。今天她选择

了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他坐在妈妈的腿上，困倦的双眼瞪着灯火通明的舞台。

创造万灵，  
荣耀归你，  
万物之主……

她有一副动听的女低音，对于像她这样不臃肿、甚至可以说娇小的身形来说很是少见。

创造万灵……

小男孩打了一个哈欠，随着最后一句歌声将头埋进了妈妈的胳肢窝里。

小汽车的车厢里

\* 译自俄罗斯《电影艺术》杂志 2008 年第 5 期。  
尤里节在旧俄历 11 月 26 日，在此日前后各一周，农奴有权从一个封建地主转到另一个封建地主家去。——编者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细碎的秋雨漂洒在挡风玻璃上。雨水随即将雨刷刮掉。手提录音机里在播放《晚祷》,唱歌的就是先前那位女子。现在她正扶着方向盘,盯着前方空旷的马路,竭力绕开路面上星罗密布的坑洼。

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懒洋洋地坐在她身边的副驾驶座上,一副明显穷极无聊的样子,不知是因为《晚祷》,还是因为车窗外单调的外省景色。

“为什么减速?”

“那边有路标。”

他们沿着水泥路堤缓缓行驶,左手边出现了一片汹涌的银灰色水面,不时卷起三角形的急浪,白色的浪花几乎触摸到了车厢。这座水库十分宽阔,约摸一公里外的水平线上能看见凋零的树林,还有教堂的钟楼,宛若海市蜃楼,又仿佛是一幅不真切的水彩画,水彩一干就将消失不见。

“快到了,”母亲说,“二三十公里,不会更远了。”

“到了那儿还有50公里。然后又是20公里。”儿子纠正道,“我受不了了,我快发疯了。”

“你好像和彼得一世一样有开阔空间恐惧症。不过忍一忍吧。到了德国就不会有这样的旷地了。”

“不对,”他表示不同意,“只不过我属于百分之五不能开车的人之一。坐在一旁无所事事我觉得很无聊,如此而已。”

他不屑地瞅了一眼正在卖力唱着“哈利路亚”的录音机,啪地按下按钮,取出录有母亲歌声的CD。将碟片装进塑料

盒子,放了另一张碟到录音机里,是奥斯卡·彼得森乐队的唱片。车厢里顿时充满了雄浑的钢琴声。窗外的水面不见了,公路变得很宽阔,让人的心情也随之愉快起来。

儿子看见了右手边一根破败的水泥柱,上面写着“尤里耶夫-波兰区”。

市郊和广场

加油站。两旁是木制农舍的自由大街。向右拐,见到簇新的储蓄所混凝土楼房——它的高大威严与这座小城的其它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路上几乎没有行人,整座城市仿佛空无人烟。再拐一个弯——来到了中心广场。右边是经过翻新的商店,这里以前是杂货摊,现在变为大众化的购物街,一家家顶上砌着石拱弧的小店挤挤挨挨的。左边是当地的内城,有着高高的土围子和白色的城墙。

“好像是往这边。”母亲说着,将汽车径直向内城拐去,停在大铁门旁,熄火。

儿子率先下车。懒洋洋的目光扫了一眼孤零零地停在铁门旁的一辆旅游大巴。他的视线落在了一块木板上,上面写着“国家文物保护计划”的字样,下面用整齐齐齐的方框显眼地标识出教堂和历史建筑的名称。

儿子转过身。内城对面坐落着两层楼的区内务处地方分局,告示栏上张贴着“通缉令”,上面有国事犯的照片复印件——这些国事犯通共只有两人,表明城里的罪案并不多。

“我们要进内城吗?”儿子问。

“不。我们先去看看外公的房子。确切地说,去看看它还剩下什么。”

她按了一下遥控车匙,车里“哔”的

一声响，圆滚滚的小排量“标致”汽车——就如汽车销售员信誓旦旦所说的那样——变成了一座难以攻克的堡垒。

“这边，这边……”她抓住儿子的手，拉着他向城里走，经过内城，经过张贴着国事犯照片的警局，走到了沥青路的尽头，之后是外省的黏土路，一直通到河边。

他们途经一座倒塌的20世纪初的教堂，有点儿像红砖砌的厂房，教堂后矗立着另一座白石砌成的教堂，只有一个圆顶，却已是12世纪的建筑。周围散落着一层楼的简易住房。一群母鸡在教堂门口啄谷子吃。

河边

“那就是……外公的房子。”她手指着河对岸。

现在那里坐落着一栋火柴盒一样的两层楼的混凝土建筑，门口挂着“酒馆”的电子招牌。招牌乃至建筑周围，热闹的人群熙来攘往。风尘仆仆、膀大腰圆的司机大佬们从载重汽车里钻出来，在灰色的入口处消失不见。这里似乎是城里为数不多的生活热火朝天的地方之一。

“外公住在酒馆里？”

“酒馆是70年代才在我们的房子上建起来的。”

“酒里有股白菜的味道。”儿子抽动着鼻子说。

“是炒大白菜。用混合油炒的。”母亲表示肯定，“这里大概是俄罗斯惟一处还能闻到炒大白菜味道的地方。”

“开车走了两百公里，就为了来闻大白菜的味道？”

“不只是两百公里的路。我们回到了

20年前。”

儿子无言以对。他不愿意看到母亲这股热情洋溢的兴奋劲，他觉得那股劲头儿在她身上有些不自然。

他们站在架设在不宽的河面上的木桥上。浅水处的水草和小鱼凝然不动。事实上，水底已经被香烟盒和“薯片”的包装袋毁了容。看来，有些市民将这条河当成了垃圾场。

“这条河叫什么？”儿子问。

“这条河叫……”母亲皱着眉头，“叫做……忘了！”她懊恼地叫道，“一个怪异的名字……好像是乌格罗-芬兰河。叫什么？！”

她开始无助地向四周张望，似乎在寻找这个名字。岸边孤零零地坐着一个垂钓的人。一群像春草一样稚嫩的姑娘从内城向河岸的方向走来，看样子像是大学生，手里拿着啤酒罐。

“姑娘们，亲爱的，”母亲连忙向她们迎上去，“这条河叫什么名字？”

起先她们急忙闪开身去，皱起眉头，弄不明白这位身穿昂贵的丝绒连衣裙的首都女士想要干什么。然后，看了看她儿子，不知何故大笑了起来。

“……这条河叫什么名字？”

姑娘们自顾自绕过他们，沿着河岸，依然哈哈大笑走上小桥。

于是她的目光落到了坐在岸边钓鱼的人身上。

“请原谅。这条河叫什么名字？”

钓鱼的人把烟头吐到河里。收起钓竿，环顾四周，急匆匆地向内城的方向走去。

“他在害怕什么……”

“他不过是在电视上见过你，”儿子猜想，“和科利亚·巴斯科夫在一起。”

“怕巴斯科夫还有可能。为什么怕我呢？”

“巴斯科夫凌波踏步，”儿子胡说八道起来，“向‘酒馆’伸出双手，唱着威尔第的咏叹调。”

“科利亚不会免费凌波踏步的。我也管不着威尔第。我只想回忆起这条河的名字。”

“你怎么也不会想起来。因为这是一条无名河。”

“这可能吗？”

“当然。就连你最爱的契诃夫还有一篇小说没名字呢。就叫《无题》。”

“得了，”她妥协道，“那我们去内城吧。”

“走吧……”儿子无精打采地同意道，看着自己的脚底下，突然吓了一跳，“不，我哪儿也不去！”

“怎么回事？”

他没有回答。但母亲却注意到他的目光……当即明白了他忸怩的原因。他脚上穿着两只不同的鞋！看来他在黑咕隆咚的走廊上半梦不醒地将鞋穿错了。最糟糕的是，两只鞋颜色不一样：一只棕色，另一只是蓝黑色。

她笑了起来。

“现在怎么说来着，晕菜？”

“我没睡醒，昏昏沉沉的。”

“你应该少喝点儿，安德柳沙。要不再多喝点儿。你知道斯塔索夫怎么对巡回画派的人说吗——因为他不喜欢他们的展出？‘喝少了，先生们！’”

“斯塔索夫……”儿子撇撇嘴，“他是

谁？我不认识。”

“现在谁也不认识他了。好了，安德柳沙。我们去内城吧。谁也不会注意到你的鞋。”

“不，我说了哪儿也不去！要不现在就回莫斯科，要不……要不你自己去。”

“我是为了你才计划这次行程的。”

“我不需要。我早就说过了！”

“那我们去商店，”母亲叹了口气，“给你买双鞋。”

她走在前面。回过头。

“你走不走？”

儿子叹口气，慢吞吞地跟在她身后。

鞋店

店里空荡荡的。一面墙边摆放着中国制造的旅游鞋，另一面墙边的胶靴鲜艳夺目。

儿子嫌恶地俯身看着旅游鞋，嗅了嗅，连碰都不碰一下。

“我不穿这个。”

“这里还有其他鞋店吗？”

售货员从填字游戏上挪开目光，茫然地瞅了一眼母亲。

“……其他鞋店？”母亲不抱指望地重复道。

“那边。”售货员挥挥手。

“有多远？”

“四天后。每逢周日。纳吉尔会运鞋到集市来。”

“谁？”母亲没听明白。

“纳吉尔！”售货员悻悻地重复道，“怎么，你们不认识纳吉尔？”

“他也不认识我们，”母亲反驳道，“我们不是本地人。”

“看得出来。”

“好极了，”儿子说，“不过就四天。顺便说说，四天后我应该在柏林了。”

他走向摆放胶靴的陈列架，突然兴奋起来。拿起一只鞋，橡胶鞋上有一个圆圈压印，里面是“一等品”的字样。他把鞋蹬进右脚，刚刚合适。

“我要了！”他兴高采烈地叫道，“太棒了！”

“你疯了，”母亲断然否决，“你要这么双集体农庄用的丑八怪鞋做什么？”

“我从三年级开始就没再穿过胶靴。”

“我从七年级开始就没戴过蝴蝶结。结论怎么样？”

“结论是，在俄罗斯，我就应该有俄罗斯人的样子。”

“不错。所以你应该穿中国制造的旅游鞋。”

“我不要。您这里有棉袄卖吗？”

“听我说，姑娘，”母亲央告道，“请您告诉他，外省人现在已经不穿胶靴了。”

售货员愤愤地望着他们。

“我这就叫警察。”她说，“有人在这里捣乱……”

“我们快走吧，”母亲说，“警察来抓我们，那就完蛋了。”

“棉袄，”儿子央求地重复道，“黑色的那种……我在电影里见过。您这儿有吗？”

“酷似面包、索尔仁尼琴式的那种棉袄？”母亲加上一句。

小城的街道

……他走在母亲前面，脚上穿着那双几乎长达膝盖的耀眼的胶靴。崭新的棉袄披在肩上。但是母亲追上来，将棉袄

拽了下来。他冲过来想抢回棉袄……

“我说了‘不行’。除非我死了！”她把棉袄藏在身后，后退一步。

“我们是来和祖国道别的，不是吗？”

“道别并不意味着要打扮成巴西人的怪模样。”

他们走近内城的铁门，铁门开着一扇小便门。旅游大巴已经开走了，看来现在就剩下他们俩了。

“米哈伊洛夫礼拜堂，钟楼，圣约翰门楼教堂，”儿子边看标示出的地名边念叨，“我们去哪里？”

“都去看看。”母亲率先从小便门走了进去。

内城里的院子

石头铺的小径。中心大教堂前高耸的钟楼。钟楼后黑色的木制小教堂。右手边高大的石屋。

“我们要两张门票。”母亲对着售票窗口说。

“到哪儿的？”售票员问，这是一个胖墩墩、年约六旬的女人，花白的头发染上了红铜色，整齐地梳在脑后。

“您看着办。”

“你们是外地来的？”

“我在这里出生。不过已经40多年没回来过了。”

“那就不用买票了。”售票员说，“你们买一件这个背心，不用买门票。”她拿出一件红色的背心给他们看，背心胸口印着一只手持一柄血迹斑斑的斧头的熊。

“多少钱？”

“500卢布。不用再买门票了。”

“你要穿这件背心吗？”母亲深表怀



疑地问安德柳沙。

“难看死了，”儿子回答，“长得和贝多芬一样。”

“我们还是买门票吧，”她说道，“下次再买背心。”

“可下次兴许就没有背心卖了，”售票员说，“门票却是什么时候都有。”

“我们还会来的，”母亲保证，“我们会像猎人守兔子一样密切关注这件背心。”

“已经停产了，”售票员失望地说，“这种拿斧头的熊的图案。如果再生产，那就是微笑的米老鼠的图案了。”

“谢列克沙！”母亲突然嚷道，“谢列克沙或者科洛克沙！”

“什么？”儿子没听明白。

“谢列克沙还是科洛克沙。”她举起食指，“我想起来了！……是叫谢列克沙或者科洛克沙！”

她双眼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内城后面的那条河是叫这个名字吗？”母亲问售票员。

“是科洛克沙。”售票员确认道，“这

里没有叫谢列克沙的河。”

“看来我还没有老糊涂！”母亲满意地舒了口气，“请给我们到钟楼的门票。”

“20卢布。”售票员失望地说，“走吧，我去给你们开门……”

她从售票间走出来，脚上穿着毡靴，毛织头巾缠在腰上。像鸭子一样摇摇摆摆地沿着石径走向白石砌成的钟楼。丁零当啷转动钥匙，打开了一扇低矮的小铁门。

“钟在上面。你们可以敲一次。这里可没有叫谢列克沙的河。”

“谢谢。”母亲亲切地致谢。“我上得去吗？”她疑惑地问，将头探进楼洞，望着昏暗中窄窄的螺旋形楼梯。

“人人都上得去。”售票员说，“这里没有叫谢列克沙的河，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他们开始向上爬楼梯。

小城上空

空中悬挂着三口大小不一的钟，从小到大排列，就像套娃一样。最小的那口就像是巨人的顶针，最大的那口声音雄浑低沉，仪态威严——宛若教堂的祭师。儿子忍不住首先敲响了它。大钟轰鸣。一只乌鸦从城墙上拍翅而起，回顾几眼，疾飞而去。

“多么辽阔啊！‘哦，我的罗斯，我的妻子，我们深知长路漫漫……’”母亲激情四溢地念起了诗，像展翅一样张开双臂，“我是一只海鸥！”

“对。飞得挺高的嘛。”安德烈冷冷地应道。

他们面前是中心广场，三辆小汽车停在商店旁，两个路人各怀心事，缓步徐





荣耀归你，  
万物之主……

下面的一个路人抬起头。  
在俄罗斯乃至整个欧洲闻名  
遐迩的天籁般的女低音从天  
上倾泻而下：

创造万灵，  
荣耀归你，  
万物之主……

行。广场之外稍远处是起伏的田野，无边  
无垠，横亘的树林将它分成一片一片的。

“这里的森林早在叶卡捷琳娜时期  
之前就遭到了砍伐。”母亲解释道，“全因  
为土地十分肥沃。据说几乎和克拉斯诺  
达尔的黑土一样。而这里地处俄罗斯中  
部，是不是一个奇迹？”

“拿这些黑土地做什么？”安德烈问，  
“要是依我，我就会在这里修建宿营地、  
汽车旅馆，像法国那样，赚游客的钱。”

“最终会发展成那样，”母亲表示同  
意，“但是旷野的迷人之处就没有了。记  
住这里，儿子。融入到祖国的空气中去。  
很快你就闻不到了。”

“哪里的空气都一样。”儿子说，“不  
过我会试试看……试着融入进去。”

她不再反驳儿子，以免破坏了情绪。  
冷冷的秋阳从云层里探出头，周围的一  
切似乎都在微笑。

母亲手扶木围栏，站在高耸的 17 世  
纪的钟楼上唱起了《晚祷》：

上帝，你的壮举惊人，  
创造万灵，

钟楼前的空场子

20 来分钟后，他们走下楼。母亲有  
些微喘，安德烈则神色忧郁而专注，似乎  
有什么暗怀的念头或者预感令他苦恼。

“现在去哪里？”

他回头看。石屋上挂着一块牌子：  
“巴格拉季昂公爵及其时代展”。

“去看‘时代展’吗？”

“我就在这里坐一会儿吧，”她指着  
长凳说，“喘口气。”

“好吧。只是别闲耗时间……巴格拉  
季昂……还有‘他的时代’……说不定是  
一个庞大的展览：每天、每时、每秒，什  
么都登记在清册上……”

他嘀咕着踏上了高高的石阶，回过  
头来……

“维也纳见……”走进上面挂着牌子  
的门口。

“可你不是不喜欢听歌剧嘛。”

“你去唱歌剧的时候，我坐在台阶上  
等你。”

安德烈走进了陈列馆。

母亲坐到长凳上，将棉袄放在身旁。

闭上眼睛……院子里只有她独自一人。眼皮和脸上的皮肤能感觉到阳光的亲吻。

一个细小的、隐约可闻的声音传入耳朵。仿佛是小提琴在远处演奏出的几个节拍。又或者是某个看不见的人唱出的曲子。她坠入了甜蜜的梦乡。

钟楼前的空场子及大门前的广场

母亲猛地歪了一下,好像被谁推了一把似的。一抖,睁开眼睛,看见自己面前站着三个女人——两个年轻女人和那位腰上缠着头巾的售票员。

“对不起,我们要关门了,”其中一个年轻女人说,“已经两点半了……”

“‘关’哪里?”母亲没明白过来。

“整个博物馆。我们今天工作到两点半。”

“安德柳沙呢?”她机械地问,同时发现两个女人的头发染成了相同的红色。

“哪个安德柳沙?”

“我儿子……他大概已经到停车的地方去了。”

“大概是……”年轻女人表示同意。

母亲从凳子上站起来,抓起棉袄,疾步走向出口。

迈出铁门,她看见了自己的“标致”车,但是儿子并不在旁边。母亲甚至特意朝车厢里瞅了一眼,说不定安德柳沙躲在车上和她一样睡着了,只不过斜躺在后座上,从外面难以发现……但是没有。车里是空的。

“那么他还留在内城里!”

女人们彼此对看一眼。

“竟会这样。我们已经把门全都锁上了……”

“他去巴格拉季昂陈列馆了……‘巴格拉季昂及其时代展’!”母亲叫了起来,“他去没去那儿?”

“好像是有人。”其中一个腿有些瘸的姑娘说,“您说的是谁?”

“我说的是参观的游客!”

“有一个,”她若有所思地说,“一整天就一个。”

“穿着靴子。乡下人穿的胶靴!”母亲竭力引导她做出正确的回答。

“不错。戴绣花小圆帽,穿着靴子。”

母亲感觉一股不安的情绪腾地袭上心头。

“他没有戴什么绣花小圆帽。”

“也可能是我看错了。”姑娘表示同意,“那得去开门放他出来!不然他在里面饿肚子怎么办?”

她们一起回到院子里,朝石屋走去。

“您在莫斯科赚多少钱?”售票员两条肥腿一踉一踉地边走边问。

“不知道。”母亲没好气地回答,“我很少去莫斯科。”

“我们这里差不多一个月挣三千。我还有一千五的退休金。靠这些钱够生活吗?”

“您还活着呢。”母亲急躁地说,她的脑子里在想别的事。

“不错,够活。甚至还有富余。”售票员出乎意料地承认道,“上个月我剩了20卢布。我需要花多少?园里有白菜,脚下有土豆……”

“就是说一切还行。还可以再缩减。”

“是啊,”女人表示同意,“上个月我一个兄弟被炒了。”

“那他不是失业了?”



“他本来就从不工作。只是老被别人盯着。于是自己把人家给炒了。”

“不要再说了，不然我要发疯了！”母亲说。

“我们这里有一个地方……”售票员继续侃侃而谈，“就是‘酒馆’。你要是看见它，赶紧掉头走。要我告诉你在什么地方吗？”

“不用，”母亲回答，“我知道在哪儿。反正我也不会去那儿。”

“我还是告诉你吧。免得你不小心跑了进去。这么着……出了内城向河边走。过了桥就离‘酒馆’不远了……找不到的话向人问一下……”

“我不要找什么‘酒馆’！”母亲大声说，“为什么跟我讲这些？”

售票员委屈地瘪起嘴。

这时，瘸腿姑娘转动钥匙，打开了陈列馆的门。

陈列馆

“有了，”母亲说，“这是他的脚印！”

她指着胶靴留下的网纹鞋印。

“安德柳沙！”她大声喊道，“我们在这里！……”

没有回应。母亲觉得脚印似乎通往一辆19世纪的马车。她跑过去，看见一男一女两个假人坐在车厢里，呆板地傻笑着。

她感到一阵恐惧。颤抖的手伸进包里，拿出手机，慌乱地拨了儿子的号码。

“关机了……”她呼了口气，听见话筒里自动应答的声音，说的是英语。

“这里没人。”瘸腿姑娘说。

“您别着急。”售票员竭力安慰她，“再说说我那个兄弟……小时候我们曾

把他弄丢了。全城都找遍了。最后到食堂一看……他坐在那里吃肉饼呢。”

“安德柳沙不爱吃肉饼。”

“就是说应该去没有肉饼的地方找他。”瘸腿姑娘得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

“那么他应该在修士居室！”售票员说。“今天我们哪些地方开门了？钟楼，”她屈指食指，“可是你们下楼了，我在你们身后锁的门……‘巴格拉季昂公爵及其时代展’……但是这里除了假人，一个人也没有。米哈伊洛夫礼拜堂今天检修。所以，只有修士居室……”

“可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难不成是不想吵醒我吗？”母亲气愤地说，“修士居室在哪儿？”

三个女人没吭声，对她的痛苦感到不解和同情。

修士居室

钥匙丁零当啷响。一道灰色的日光冲进逼仄的石间，一顶高筒僧帽套在木头十字架上，一张没有铺被褥的床——确切地说是粗木板做的老式床榻，整个空间就被塞满了。床边的矮几上一本皮封面、带锁扣的《圣经》落满灰尘。一扇小小的窗子朝向院子，不透光。

母亲放了一片伐力多到嘴里，跑了出去。三个女人听见她的鞋跟敲打石阶的声音。

内城里的院子

和基日岛上的教堂有些相似的木结构教堂。修道院花坛里因为秋天的来临而枯黄的草药。大门紧锁的米哈伊洛夫礼拜堂。寂静无声的钟楼。四周静悄悄的。只听见途经的飞鸟拍翅的声音。

母亲在内城不大的空间里团团转，

脚步踉跄，喘着粗气。就在她绕着城墙跑、朝早就枯竭的水井里看的时候，博物馆工作人员一直耐心地等着。

渐渐地，她不再狂躁。慢吞吞地走到女人们跟前，头发散乱，脸色苍白。

“我们要关门了，”瘸腿姑娘对她说，“已经三点了。”

“我为什么要这么着急？”母亲自言自语道，“他一定是去吃东西了。有这种可能吗？”

“有可能。”售票员应声答道。

“‘酒馆’。”售票员压低声音说，“城里还有一家餐馆，但是离这里很远……”

母亲双目茫然地看了她一眼，带头走出内城的大铁门。

瘸腿姑娘丁零当啷将钥匙转了三圈，锁好门。

河边

天色渐暗。白昼即将结束，暮色还未降临。一度露脸的太阳重新躲到了密实的云层后。母亲匆匆地走在科洛克沙河岸边。走到混凝土桥上，避开一辆驶过的重型卡车，来到铺了沥青、停满货车的河对岸。“酒馆”已经亮起了灯，招牌上的字一闪一闪的，就像新年枞树一样。

一个头发蓬乱、留大胡子的汉子坐在石凳上，头搁在膝盖上，看样子是睡着了，母亲从他身旁经过，走进玻璃门里。

“酒馆”

酒馆里烟雾缭绕。桌子好像小刀戳着的蘑菇一样，风尘满面的劳动人民站在桌子旁，就着炒大白菜喝烈酒。

母亲焦灼的目光环视众人。一张面孔、两张、三张……不，全都不是。她走到前台，向一个身穿脏兮兮的围裙的胖女

人问道：

“有没有一个小伙子来过……穿着胶靴的？”

“这里所有的小伙子都穿着胶靴。”服务员回答道。

母亲瞧了一眼地上，只看见大小、款式各异的胶靴，短的、中长的、长筒的。甚至还有一双是在沼泽地干活用的、长及大腿根部的。

“安德柳沙！”她在烟雾中呼喊道。

“是我！”最近的一张桌子旁的男人说。



“不，”母亲忧心忡忡地噓了口气，“不是您。”

她向门口走去。

“柳夏？！”背后突然传来一个惊讶的声音。

她转过身。在她身后站着两个看上去相对斯文的男人。其中一个脸刮得光光的，樱桃一样的黑眼睛显出探询之意，喊住她的大概就是他。

“我不是柳夏。”母亲回答。

“请原谅,女士。认错人了……”他的嘴里露出了一颗金属镶牙。

母亲没有回答,转身离开。镶假牙的男人若有所思地目送她离去。

“她是谁?”他的同伴问。

“柳德米拉·帕夫洛夫娜·马雷舍娃,”有镶牙的男人说,“外号‘天不怕地不怕的柳夏’。以前在本地医院洗地板。在合唱团唱过歌,收藏过赃物,曾经流落街头……总而言之,她身上有很多故事。”

“她似乎不太像流落街头的人。”

“看来她改头换面了。她应该是满40岁……”男人顿了顿,脑子里计算着什么,“……前年的时候。两年之间能改变很多事情。”

“结婚生子了?”同伴猜测。

“可能吧。不过我不相信。柳夏不是那种甘于寂寞的人。看来她又回来了。肯定会闹出点儿什么事,到时有你受的。”

“再来点儿?”同伴问,想往他的酒杯里再倒些酒。

“够了,格努克,”男人用手盖住杯子。“也有可能是认错人了,”他想了想,补充道。

“谁的甜菜?!谁要了甜菜?!”服务员把盘子啪地一下放到木柜台上,盘子里装着刨成丝的暗红色的甜菜。

广场

一盏灯孤零零地在风中摇荡,黄色的灯光投射在区内务处的大楼上。莫斯科牌照的“标致”汽车就像一只甲壳虫,紧挨着内城的铁门。

母亲匆匆扫了一眼告示栏——“通缉令”上两个男人粗犷的脸引人注目。她

跨入警局的门。

值班室

值班室里坐着一个16岁左右的瘦弱小伙儿,几乎还是一个孩子,嘴巴上长着乳白色的茸毛,穿着普通人的衣服,正在边摁按钮边看手机屏幕上的东西。手机响起了汽车紧急刹车声的铃声。

“我的家人失踪了。”母亲对他说。

年轻人的目光从手机上移开,关上屏幕。

“我儿子。”

“您的证件。”年轻人迟疑地说。

“您是谁?警察吗?”

“警察现在不在。我暂时替他一会儿……”年轻人犹疑地嘟哝道。

拿起护照,开始仔细地研究起来。

“您在电视上演出过吗?”他好奇地问。

“这算什么?!挖苦我是不是?”母亲嚷了起来。

“我儿子不见了,他还在说什么电视!”

“您别喊。我不过是……随口问问。”小伙子服输了。

“那我也随口说说,”她没有平息下来,“如果你们不帮我,我把这里全拆了,说到做到。”

“这里没什么可拆的,”年轻人说,“栅栏,石头和装印鉴的保险箱。这些您要吗?”

访客说不出话来,脸上泛起红晕。

“是巡回演出来到这里还是随便玩玩?”

“来怀乡的。”她艰难地嘀咕道,竭力压制怒火。

“好吧，”他说，没听明白中间那个词，将护照还给她，“那么您有什么事？”

“我儿子……不见了……”

年轻人用自己的手机拨了个电话。

“是我……”他对着电话小声说，“有一个莫斯科来的女演员……来怀——乡的……她儿子不见了。”

“您儿子多大了？”他问道，将电话里的吱吱声翻译成语言。

“已经20多了。”

“20多岁……”年轻人对着电话说。里面又响起官气十足的声音。

“什么时候不见的？”年轻人问母亲。

“把电话给我。”母亲用力从他手里夺过手机，“我是俄联邦功勋演员！”她对着话筒大叫，“我在莫斯科到处都有熟人！知道赫尔曼·奥斯卡罗维奇吗？我在他家随意进出。”

电话里传来嘟嘟声。

“断了！”她舒了口气，“再帮我打过去！”

“按照法律，必须失踪三天以上，”年轻人侃侃道，收起手机，放进运动服口袋里，“我们才会立案处理。”

“那我该怎么办？”

“看来只有等待。”

“等待……”她慌张地说，“等什么？最主要的，在哪里等？”

“他说不定回莫斯科了……您往莫斯科打电话了吗？”

“我真笨！”母亲一拍额头，“他准是在莫斯科！”

她双手颤抖地从包里掏出手机，拨了莫斯科的号码。

一个身穿警服的人走进房间，手里

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有酸奶和一条白面包。

年轻人站起来，把位置让给他。

“是她？……”警察坐下问道。

年轻人点点头。

“娜杰日达·奥列戈夫娜？……”与此同时母亲对着电话说，“是我，柳芭……您能不能去敲一敲我家的门？看看安德柳沙在不在……总之，如果他在家，请告诉他，我马上就从尤里耶夫出发……对。我不在莫斯科……我等着……麻烦您跑一趟……”

警察用牙齿撕开纸盒，将酸奶倒进杯子里。

“没有其他人吧？”他问。

“没有，就她一个。”年轻人回答。

“你可以回家了，米什卡。没事了。”

“你什么时候回家？”

“早上。值完班再走。告诉妈妈，我要耽误一会儿。我还得去一趟道路交通安全检查局……”

儿子点点头。

“是，娜杰日达·奥列戈夫娜！”母亲对着电话大喊道，“没有人开门？”她压低声音嘟囔道，“没人？……嗯，好吧，对不起……”

挂断电话。

“邻居去我家按过门铃……家里没人。”

“还剩下两天，过去的半天按一天算。”警察对她说，“后天我们受理您的申请。当然，如果到时还没找到他的话。”

母亲神色木然地坐在那儿。

“您这里有地方过夜吗？”

“火药厂，”警察严肃地说，“那里现

在空着。”

“下次吧。”

“也许,小伙子出去玩了?您给他女朋友打电话了吗?”

“他没有女朋友。”

母亲向门口走去。

“他们来这里做什么?”待她出去了,警察问道,“想给谁一个惊喜?”

内城前的广场

母亲走到自己的“标致”车旁。挨着车后轮坐在地上,双手抱头。

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坐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夜色漆黑,没有星星。只有钟楼被院子里向上照射的两盏探照灯照亮,仿佛一条白色的火舌。

突然,有人往她肩上披上了一件棉袄。

母亲一抖,回过头。后面站着内城的售票员,建议她买鲜血淋淋的熊图案背心的那个女人。

“您的棉袄落在我们那儿了。”她说,“夜里很凉。不加衣服可不行。”

“对。谢谢。”

“还没找着?”

她摇摇头。

“要是他还活着,”母亲突然毅然道,“肯定会给我打电话。”

“万一他把手机弄丢了昵?比如掉进河里了?那怎么办?”

“那就知道了。”

“我也不知道。”女人说,“去我家吧。别坐在这儿。会着凉的。”

伸手拉她起来。领着她走到内城后面,那里坐落着一些私人的平房。

平房的房间里

桦木劈柴在炉子里噼啪作响。房间亮着一盏昏暗的灯,灯罩烧破了几个窟窿。桌上的碟子里盛着红通通的马林果果酱,碗里的土耳其茶冒着热气。

母亲拿起铝勺,舀了一勺茶水送到嘴边。

“……饼呢?”

“请原谅,我吃不下。”母亲将勺放到碟子里。

“相反,您现在应该吃点儿东西。茶能让您放松神经。”

“有什么好放松的?要是安德柳沙有什么意外,我也不能活了……”

“首先,他不会出事。”售票员说,“再说了,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

母亲包里的电话响了。她激动地翻开手机盖,把手机放到耳边。

“喂?!”

电话里传来叽里呱啦的德语。



“对,是我。”母亲用德语对着话筒说,“对不起,我现在不方便说话。”

挂断电话。

“苏黎世打来的。”她解释道。

“在我们锡姆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



事……”售票员咬下一小块方糖。

“哪儿？”

“锡姆。是一座城市。事情发生在瓦斯科夫身上。您知道瓦斯科夫吗？”

母亲摇摇头。

“格里沙·瓦斯科夫。她娶了萨莎·特鲁尼娜。知道萨莎·特鲁尼娜吗？”

“不知道。”

“奇怪。大家都知道他们。郎才女貌的一对。长得又高、又端正……虽然格里沙曾经做过贼……不过事情不在这里。总而言之，他们在一起和和美地过了一年。然后到了春天，格里沙要挖地窖储存土豆。眼瞅着铁锹撞上了什么，像火柴棍一样给弄折了。还以为是宝藏呢。于是用双手去刨，哪知道是炸弹……像花生一样，一个挨一个躺在那儿。打仗用的炸弹。他只好去找工兵。工兵们花了一整天把这些炸弹装上车，运去销毁。然后在城外引爆。原来，格里沙和萨莎一整年都生活在这炸弹上。生了孩子，萨莎还读完了设计课程，总之，蜜月持续了一年。”

“后来呢？”母亲问。

“后来的故事最有教育意义。两口子崩了，就像那些炸弹一样。各飞各的。格里沙开始酗酒。萨莎在科利丘吉诺找了份工作，但很快就失业了。格里沙走后她又生了个孩子。他去了苏兹达利，后来据说跑到科夫罗夫鬼混去了……至今他们还在起诉，打官司要求给赡养费，但是找不到人……”

母亲撇撇嘴。

“结论是什么？”

“结论是，”售票员解释道，“生活在炸弹上比没有炸弹时更幸福……”

突然，有人在漆黑的窗户上敲了一下。不知是瞎眼的鸟撞上了还是哪个粗鲁的人在宣告自己的到来。售票员脸色煞白。

“灯，”她嚷嚷道，“他看见了灯光！”

她把灯关了，房间里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只有炉子温暖的火光映照在天花板上。母亲发现，窗户装上了栅栏。

“丹尼卡！”院子里传来声音，“你在哪儿，丹尼卡？！”

“别动，不要开门。”女主人耳语道，“是尼古拉，我的堂兄弟……”

大门口传来捶门声。

“丹尼卡……”

“跟我来，”售票员仍然耳语道，“我现在给你铺床。”

“可您的炉子生着火，”母亲想到一点，“他看到烟囱冒出的烟就知道我们在家。”

“也有可能我生好炉子就出去了。也有这种情况，对吧？”

女主人拉着母亲的手，领她到了炉子后面的一间小屋。屋子里放着一张铁架子床，床靠背上有闪闪发亮的圆球。两个枕头上盖着薄纱枕巾。

母亲用手摸了摸被子。

“是羽绒被吗？”

“天鹅绒的，”售票员骄傲地说，“爸爸妈妈传给我的，但愿他们能升天……”

与此同时，斧头砸在大门上，整座房子都震动起来。

“这门要是经不住怎么办？”

“应该经得住。我不久前刚加固了合页。”

一个杯子从床头柜上滑下来摔碎



了。

“最好还是让我报警吧。”

“绝对不行。他会坐牢的！”女主人说着，收拾起地上碎片。

“那更好！”

“怎么能害别人坐牢呢？听从上帝的安排吧。晚安！……”

“看来，这就是你的炸弹？”母亲问，言下说的是那个她不认识的人对房子发动的攻击。

“什么炸弹？……”女主人起初没明白，“哦，对，炸弹……”她终于会过意，笑了起来，“晚安……”

踮着脚走出她的房间。门口的撞击声仍然没有停止。每撞一下，母亲就感到肉跳一下。

她坐在羽绒被上。从包里掏出手机放在床头柜上。

和衣躺到床上。闭上眼睛。

“咚”一声、两声、三声……

平房的房间

电话铃响。母亲一抖，醒了。窗外可见暗淡的晨曦。屋子里一片寂静。夜里的攻击结束了。

手机响了，闪着绿光。

她双手颤抖地拿起电话放到耳边，按下接听键。

“喂！……安德柳沙？！”

里面传来了嘟嘟声。

母亲看看屏幕。上面没有显示来电号码，只有“未接来电”几个字。

“再打过来呀！看在耶稣基督的份上……”

但是电话一声不响。

“柳芭，你醒了？”传来了女主人的声

音。

“对，醒了，”母亲回答，“请进。”

售票员停在房门口。

“您的科里卡到哪儿去了？”

“谁知道。敲到了将近凌晨一点才停手，到别处去了。”

“他要什么？”

“应该是想要钱。离下次领退休金还有整一个月……”

“我和他谈谈吧，”母亲说，“跟他把一切说清楚。”

女主人怀疑地瞧瞧她。

“没有必要。他怎么也不会明白的。我想告诉您……不过您可别着急！”

“什么事？！”

“我说，别着急……在那里……在河边……”售票员没有把话说完。

母亲摇摇欲坠，一只手捂着胸口。

河边

她从坡岸向河边一路狂奔。

下面站着一小群看热闹的人。母亲狂乱地用胳膊肘推开人群，她已经失去了理智。

一具发青的尸体摊开双臂躺在地上，旁边站着不久前见过的那个离开岗位去买酸奶的警察。他身旁站着一个镶假牙的男人，正是在“酒馆”里将母亲误认为“天不怕地不怕的柳夏”的那个人……但是她没有认出他来，因为酒馆里的一面之缘太过匆匆，母亲脑子里当时在想着别的事。

“您儿子？”警察指着尸体问。

“我儿子。”她喘了一口气。

她眼前一黑，两腿发软。要不是镶假牙的男人扶住她，她已经跌倒在枯黄的

草地上。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瓶氨水凑到她鼻子下……母亲的眼皮颤动了一下，睁开双眼。镶假牙的男人小心地扶她坐在岸边，将自己的外套披在她身上。

“可以说话了吗？”

母亲点点头。

“您应该仔细看清楚，”警察说，“说不定弄错了。”

“不。他是安德柳沙。”她喘了口气。

“那为什么文身写着‘瓦列克’？”

“哪里有文身？您胡说什么呢？！”

“他的肩膀上有文身。”

她探身向前，几乎是爬到尸体旁边，因为两只脚完全不听使唤……溺毙者的左边锁骨上蓝色的镰刀和锤子文身赫然在目。旁边是一圈麦穗，环绕着简洁的题字：“瓦列克·1970”。

“可是他身上并没有文身。”母亲说。

“您怎么知道？”“酒馆”里的那个人怀疑地问。

“我不知道谁知道？”母亲反问道。

“也许，他有个叫瓦列克的朋友，”警察推测，“他们俩在70年相识？”

“有可能。只是我儿子70年的时候还没有出生。”

“那怎么办？……不解之谜，”镶假牙的男人沉思着说，“您还是再仔细看看吧……也有可能，70年出生的不一定是死者本人，而是我们不知道的某个瓦列克。”

“那他为什么要把别人的出生年份文在肩膀上？”警察问。

“可见对他很重要，那个人或者是他的出生年份。”镶假牙的男人沉思着说。

“胡说，”母亲说，“您在胡说八道。”

“也许。”镶假牙的男人表示同意，“最终也许这并不是出生年份。而仅仅是一个数字组合，包含着不为我们所知的意义。”

“又在胡说。”她固执地反驳，“这根本不是我儿子。”

“您确信？”

“好像，”母亲说，“不过不能完全肯定。我无法辨认。”

“您儿子什么时候不见的？”镶假牙的男人问。

“昨天。下午的时候。”

“也就是说还不到一天。但是，根据尸体的浮肿程度看，瓦列克在河里至少已经躺了三天。”

“我关心的不是这个，”警察插话道，“而是他的大腿上怎么有一只河虾？科洛克沙河里已经30年没见过河虾了。”

“尸体有可能是从另一条河被转移到这里，”镶假牙的男人说，“扔进了科洛克沙河，为的是让我们以为他在这里溺毙。实际上他是在别的地方淹死的。有河虾生长的地方。”

“现在哪里有生长河虾的地方呢？”警察苦恼地问。

一阵难耐的沉默，他的问题没有得到答案。

“听着，我要走了。”母亲失去了耐心，“请拉我起来。”

将手伸给警察，后者和同伴一起把她从地上拉起来。

“您住在哪里？”镶假牙的男人问她。

“在丹尼娅家，她是你们这儿博物馆的售票员……离内城不远。”母亲回答。

“知道，”警察点点头，“我们找得到。”

母亲开始从坡岸向上走。

“新人，新问题。”镶假牙的人喃喃道，用意味深长的目光目送母亲离去。

“你是在说瓦列克吗？”警察不解地问。

“不。不是瓦列克，瓦列克已经不算一个人了。他的名字应该小写。”镶假牙的人说。

平房的房间

母亲回到家，第一眼看见的就是仰头躺在地上呻吟的女主人。

“丹尼娅……亲爱的，你怎么了？！”母亲手忙脚乱。

“哎哟，打死我了！……哎哟，要死了，这个吸血鬼，真狠心。”售票员呻吟着。

母亲抓住她的肩膀，扶她坐到地上。女主人的脸肿了起来，青一块紫一块，面目全非。

“是科里卡？”母亲猜测。

“是他，畜牲。”塔季扬娜确认。

“你可能有脑震荡。应该去医院！”

“绝对不行，”女主人吓了一跳，“那里没有药。”

“那人们到哪里治病？”

“在家治病，到医院就是送死。”塔季扬娜说，“你扶我起来躺到床上。我自己会有办法治好的。”

“好吧，来。”

母亲费力地将她从地上拉起来，扶她到床上。让她躺在被子上。

“现在几点？”

母亲看了看手机屏幕。

“刚过10点。”

“我得去博物馆卖票！”女主人呻吟道。

“你这个样子能去哪里？不行。”

“确实不行。”女主人同意，“你的面色也很差。那个淹死的人怎么样？”

“他也面目全非。”母亲说。

“是你要找的人吗？”

“不是，是瓦列克……”

“明白了……”女主人点点头，“我们两个都需要养好身体。到餐柜把药水拿来。在一升装的瓶子里。”

“怎么，里面装的是缬草酊？”母亲从餐柜里拿出一个沉甸甸的瓶子，问道。

“萨莎·特鲁尼娜给我的。能治百病。她自己配制的。”

“大概就是她的这个东西让格里沙变成了酒鬼。”母亲拔掉塞子，闻了闻瓶口，猜测说。

“不见得吧。你能让公牛酗酒吗？灌醉它可以。但要让它上瘾，多少酒也不够。拿杯子倒出来。”

母亲倒了两杯浅褐色的、略显浑浊的液体出来。

“为健康干杯！”丹尼娅说完，一饮而尽。

“啊呀……这不是缬草酊。”母亲哼道，皱着脸，用袖子捂住鼻子。

“这么着，你跑一趟博物馆，告诉姑娘们，今天不用等我了。”

“要不要我帮你顶班？”母亲提议。

“你会数钱吗？”

“不会。”

“我也不会……那里也没什么钱可数。别卖门票，卖背心。卖出一件背心你

就有提成。”

“那我走了。”母亲说。

丹尼娅在枕头底下摸索一阵，掏出一串钥匙。

“售票处的……拿着。”将钥匙交给母亲。

然后用手指将杯子里面刮干净，放在地上。

母亲想了想，没有照着女主人的样子做，而是将两个杯子一起放进水池里。

准备离开，已经到了门口又补充一句道：

“我觉得自己是疯了。儿子都不见了……什么背心？什么门票？”

小城的街道和内城

她穿着黑色的棉袄。头脑中开始响起了钟声。母亲以为有人在钟楼上敲着玩，也许是某个短暂停留的游客，就像她和安德柳沙那天随便敲着玩，吓得乌鸦拍翅而飞……

看了一眼自己停在内城门口的“标致”车。她发现有一双眼睛在警局的窗子后盯着她看。但是窗帘立刻就拉了下来。那张脸孔不见了。

母亲走进博物馆。试着用钥匙打开售票处的门。

就在她忙着试钥匙的时候，瘸腿姑娘走了过来。

“丹尼娅到哪儿去了？”

“塔季扬娜不舒服，”母亲说，“我来替她。”

“可是您不是财务负责人！”姑娘大吃一惊，“这不合规矩。”

“我不知道。您自己想清楚吧。谁在财务上、谁在精神上对这些负责……”

“不。这不行。而且您身上……有酒味！”瘸腿姑娘叫了起来。

这时，门锁打开了。母亲迈进售票处的门坎。坐在椅子上……

“您要不要买只熊呢？”她对站在敞开的门外的姑娘说，“很漂亮的，鲜血淋淋的……”

“我要叫警察了！”瘸腿姑娘尖声说，“我……”

她没有说完，因为从上空又传来了钟声。

“奇怪，”她小声说，“真奇怪……”

钟声又响了一下。声音起伏不定，畏畏缩缩的，但很真切。

“您开了钟楼的门吗？”

“什么门？”母亲问，“您胡说什么呢……我连这扇门都还没关上呢。”

“可钥匙在您手上。确切地说，在丹尼娅手上，”姑娘解释道，“可能就在这一串里面……”

低沉的钟声再度传来，两个女人同时颤抖了一下。

瘸腿姑娘吓得瞪圆了双眼，一瘸一拐地向钟楼走去，推了一把包铁皮的门。

门锁着。

内城里

“……您的证件。”说话的是她已经认识的那个镶假牙的男人，探头向售票窗口里看。

“您的证件呢？”母亲问。

那人把自己的证件递给她。母亲扫了一眼打开的封皮，叹口气，将自己的护照递过去。

“……柳波芙·巴甫洛夫娜……”他打开证件，嘀咕道，“嗯，嗯……”

“怎么,您没听过歌剧吗?”母亲惊讶地说。

“以前常去……我们这里天天都有歌剧……”他仔细看了一遍登记印戳,“您大概是叫柳夏吧?”

“关柳夏什么事?”

“是不是?”

“听着,年轻人,”母亲不耐烦地说,“柳夏是柳德米拉的小称,明白吗?……而柳波芙的小称是柳芭,明白吗?……柳芭这个名字,就算在欧洲也是大名鼎鼎的。”

“不见得。”他叹了口气,不太情愿地将护照还给她,“我们这里不也是欧洲吗,”他朝旁边一歪头,“大家只知道有个柳夏,而不是柳芭。”

“你们这儿是欧洲?”母亲不相信,“我看是典型的蛮荒地。”

“是的,我们是野蛮人,我们是亚洲人。有着贪婪的吊梢眼……”他背诵道。

“您竟然知道勃洛克?”她惊讶地说。

“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镶假牙的男人转身问瘸腿姑娘:

“就是说,有钟声响?”

“对。”

“而门是锁着的?”

“锁得紧紧的。”

“您也听见了?”他转向母亲。

“听见了。要是你们把我儿子锁在里面了,我一定去告你们!”

“请把钥匙给我。”他伸出手,母亲递给他钥匙。

“我们侦探行里有一句俗话:‘不许诺——不行动,一许诺——必达成。’”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母亲一眼。

走向钟楼,开始试钥匙。

钟楼

风在上空嬉戏。几口钟在阵阵袭来的强风中微微摇晃。

镶假牙的男人没有靠近钟,而是跪下来仔细查看起木板地来。瘸腿的博物馆工作人员和母亲屏气凝神站在他身后。

“……42码,”他一边察看一边嘀咕,“准确地说,是42码半。塑胶靴,一等品。”

“是他!”母亲叫起来,“安德柳沙到过这儿!”

“看来是他敲响了钟!”镶假牙的男人说,“只是,为什么他不现身?为什么要玩捉迷藏?可能您的安德柳沙在使性子吧?大概天天晚上出去买醉吧?有这回事吗?”

“您瞎说什么?”母亲被激怒了,“什么开车?给谁开车?”

“不是开车。”侦探耐心地解释,“不过,您这又不是在哥本哈根。跟您说不清。”

他俯下身,几乎贴着地板,耸了耸鼻子。

“瞧,他不是独自一人……”

“和谁一起?!”母亲吓得倒抽了一口气。

“37码。”

他直起身,专注地看着母亲的眼睛。

“您的鞋码,柳波芙·巴甫洛夫娜。”指了一下她的鞋,“没有其他的脚印了。”

“为什么一定是我的?难道城里没有别的女人了吗?”

“别的女人是有的。但是没有其它鞋

码。”

“我们商店里卖的鞋从 38 码开始。”瘸腿姑娘解释道。

“为什么？”母亲不明白。

“天知道为什么，”侦探说，“为了把我们这些侦探搞糊涂。到处都是一样的脚印。凶手的、受害人的——全都一样。但是这里的情况很清楚……完事了，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什么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没什么。我随便说的。顺口。”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母亲说，“对了……我明白了！”母亲叫了起来，为自己的猜想感到惊讶。“这是昨天留下的脚印！……我昨天和他一起上过钟楼，您明白了吧？是昨天，不是今天！”

镶假牙的男人面无表情地看着瘸腿姑娘。

“除了他们，昨天还有别人来过这里吗？”

“不记得了。好像没有……”

“有还是没有？”

她摇了摇头。

“我们下去吧，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侦探失望地说，“这里不会有什么线索了。”

“那么今天到底是谁敲的钟？”瘸腿姑娘问。

“天知道是谁。风。”

镶假牙的男人踩上了吱呀作响的楼梯。

内城里

“买只熊吗？”母亲指了指背心，对他

说。“这里已经有一只熊了——萨什卡。”

“您指的是动物园？”

“我是说我儿子，”侦探解释，“早就该把他送进动物园了，说真的。”

“不只他一个。”母亲表示同意，“把他们都送进去——什么动物园也不够用。”

“我们内心的动物性是很可怕的，”侦探若有所思地说，“不过这已经属于哲学范畴了。很难理解，对吗？”

“您有什么能治头疼的药吗？”母亲问，“那样我还可以再听你说一会儿话。”

他在衣兜里翻了一阵，掏出一片沾满灰尘的药片。

“只有一片伐力多。”

母亲疑惑地把药片举到眼前，用手帕擦干净，这才放进嘴里。

“我们这里挺好的，是吗？”镶假牙的男人说，留心观察着她。





母亲不吭声,点点头。

“可我不喜欢,”他突然斩钉截铁地说,“尽快离开这儿吧……”

“我哪儿也不去,”她说,“明天你们就受理我的申请立案。要是不受理,我就上总检察院去,我在那里有熟人!”

“好吧,好吧……”他挥挥手,“您真是火性子。所有演员都这样吗?”

“所有功勋演员都这样。”

“他们都在总检察院供职?”

“您是什么意思?”母亲问道,疼得皱起了眉头。

“别急,柳夏。我的意思是,满脸醉容地来上班很危险。”

“什么‘来上班’?”母亲生气地说,“您怎么回事,疯了吗?我又不是这里的人!”

“那您为什么有钟楼的钥匙,既然您——不是这里的人?您坐在售票处里,也没有人赶你走!”

他戴上了之前一直拿在手上的帽子,有点儿像一个牛仔,不过是来自俄罗斯中部原野的外省牛仔。

“祝您好运,柳波芙·巴甫洛夫娜。改天见。”

“明天见。”母亲提醒道。

他彬彬有礼地鞠一躬,向铁门走去。

母亲久久地目送他离去……

城里的街道

她步履蹒跚地向售票员家走去。旁边突然响起了手机铃声。母亲以为是自己包里的电话响,伸手进去拿……但原来是一个路过的、看上去像大学生的姑娘的电话响了。

姑娘把电话放到耳边,不知为什么

哈哈大笑起来。

“我的电话呢?”柳芭疑惑地自言自语道,在包里翻找。

翻遍了整个包,又开始掏自己的口袋……

“弄丢了!”母亲大叫一声,转身顺着来路往内城跑……

脚底下的空塑料瓶……慌慌张张从她身边冲过去的狗……翻倒在地垃圾箱……不。全都不是。

离内城不远的地方,工人们在铺沥青马路,这时已经准备收工回家了。

柳芭盯着黑乎乎的、尚有余热的路面……

“那是我的电话!”她惊呼。

果然,在铺上去的黑色沥青糊浆里露出来一个塑料盒子……

“我的手机在那儿!”母亲吓得对一个穿着桔色衣服的工人大叫。

工人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

“见鬼!”工人倒抽了一口气,“彼佳,我们好像把她的手机埋进去了!”

“现在怎么办?”他的同伴问。

“用铁锹铲出来就没事了……”

彼佳唾了一下手心,将铁铲插进还没有干的沥青里。

“拿着,好不好……”他的铁锹里显出一个黑乎乎的被烧熔的手机,“是您的吗?”

母亲无言以对。将扭曲变形的手机捏在手里,慢吞吞地回家去了,好像迷途的羔羊。

“你觉得还能修好吗?”彼佳的同伴问,久久地目送柳芭远去。

“用绝缘胶带粘一下就没事了。”彼

佳说。

“现在在哪儿能买到质量好的绝缘胶带呢？”

“买不到。”

彼佳用尽全力将挖出来的窟窿用铁锹压平。

平房的房间

房子的女主人坐在餐桌旁，双手托着头在打盹。旁边是装酸白菜的汤盘，碟子里两个抹了葵花籽油的烤土豆已经凉了。窗外天色已黑。

母亲咚地坐到她旁边。瞧了一眼放在桌沿上的装着灰色液体的瓶子，拿起了，对着光细看。

这时，丹尼娅醒了。

“我在吃晚饭。”她说，“一直等着你回来吃晚饭，你老不来。”

“她往这自酿酒里掺了什么东西？”母亲问。

“我忘了告诉你。萨莎在里面加了苯海拉明，可以治头疼，那就不用再喝酒解醒了。”

“可我的头疼得更厉害了。”

“那是因为你只喝了一点儿。应该喝上三杯。立马就好。”

“真的？”母亲怀疑地问。

“百试不爽。没问题。”丹尼娅给她倒了一杯灰色的液体。

“找到了吗？”

母亲没说话。

“会找到的。祝我们健康！……”

女主人向柳芭举起自己的杯子。

“真高兴。”售票员咬了一口土豆，说，“我不喜欢一个人住。现在你来了。还是个女演员。谁见了都高兴。虽然你可能

不太感兴趣。你应该配一个男演员。你有相好的男演员吗？”

“没有。”母亲说，“我丈夫15年前就去世了。”

“有福气，”女主人叹了口气，“你走运……我的意思是，我一直都没有结婚。没有男演员，什么人也没有……这更糟。”

“就像人们常说的，”母亲说，“没有丈夫——也就不需要丈夫。可是如果失去了生命中的惟一，那种痛苦难以承受。”

“那你是怎么承受过来的？还是有人在身边支持？”

“对……一个芭蕾舞剧导演。但是为了不让安德柳沙受刺激，我离开了他。”

“是真的吗，”女主人压低声音，“据说所有跳芭蕾的……嗯，你明白的。”

“什么？”母亲不明白。

“嗯……就是男人和男人。”

“瞎说。不是所有的。”

“但是很多都是，对吗？”

“有时候会有。”

“我们这儿也有，”塔季扬娜肯定地说，“有时候。”

“但他们也不全是跳芭蕾的吧？”母亲推断。

“不全是。但他们全都是——畜牲。”售票员突然沉下脸，“我可以肯定。你自己是不是搞芭蕾的？”

“我是搞声乐的。”

“唱小曲的？……”塔季扬娜突然扑哧一下笑了，“那你得陪我喝一杯……”用小指头擦干净自己的杯子，往里倒上灰色的液体。

给母亲的杯子里也倒上。

“祝所有的婆娘都能找到男人。愿家庭生活和私人生活里不要有什么芭蕾。”

“会的！”母亲表示附和。

她们碰杯，将杯子里的东西一饮而尽。

“你都唱些什么小曲？”塔季扬娜问。

“小曲？……这样的……”母亲突然用低沉洪亮的嗓音唱道：

我给你写信 还能如何，  
我还可以说什么？  
我深深知道 在你心里……  
我多么微不足道……

她的歌声有些嘶哑。但女主人仍然惊叹地张大了嘴巴。

“就这些，”母亲说，“完了！”

不再说话。伸手从包里掏出手机。

一怒之下，猛地将它摔在地上。电话碎成了几块。她拿起杯子，想了想，像女主人那样用小指头将里面擦干净。用尽全力摔到脚下。

“对！”丹妮娅尖叫道。

她抓起盘子，也猛地摔到地上。

“好！”母亲大叫，“还有什么？”

恶狠狠的目光落在了瓶子上。

“不行，”女主人说着，将瓶子紧紧抱在胸前，“不给。”

“我们有点儿闹过头了。”母亲舒了口气，冷静少许，“我想睡觉了，累死了。我收拾一下。”

“随它去吧……”丹妮娅无所谓地说，“又没影响谁。”

“不，这样不行。”

母亲从屋角拿来笤帚和簸箕，扫起碎片，拿到院子里。

院子

低矮的木栅栏外站着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黑暗中他们的身影就像是棉花做的。

“是你在唱吗？喂，接着唱吧。”其中一个男人说。

母亲打量了一番聚集的观众，开始轻声地、满怀深情地唱起来：

伏尔加河上的峭壁，  
长满了青苔……

声音突然断了。

她像离了水的鱼一样张大嘴吸气，忽然惊恐地发现，自己唱不出来了。喉咙发出的声音就像自行车气筒打气的滋滋声。

观众等着她继续唱。

“唱完了……”母亲翕动嘴唇说，“走吧。”

挥了挥手。

男人们不管怎样还是鼓了鼓掌，消失在黑暗中。

她坐在木头凳子上，清了清喉咙想……

唱了几个音，但是中气不足，音色不纯，还有些走调。

她大声啜泣起来，因为恐惧而浑身直打冷战，因为她又失去了另一样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但是冰冷的寒夜迫使她停止了哭泣，清醒过来——至少在表面上。

她的目光落在了手机的碎片上。



环顾四周,想找一个倒垃圾的地方。看见了一把孤零零地立在篱笆旁的铁锹。

她在地上挖了一个小坑,将碎片倒进去,埋上土。

她觉得自己似乎将希望一起埋藏了进去。

警局的房间

“……瓦西里奇科夫·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身高1米78,体重72公斤,1985年生。大学学历。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钢琴专业。到此的目的是怀乡。请看一下有没有错漏……”镶假牙的男人将写好的纸递给母亲。

母亲眯缝起近视眼,看了一眼,点点头。

“是不是有什么特征?”

母亲没出声。

“我没听见回答。”

“嗓子……”她嘶声说,指了指胸口。

“喝点儿矿泉水或者牛奶,试过吗?”她忧郁地望着他的眼睛,再度沉默。

“为免有人耳朵不灵光,我再念一

遍。”侦探再度大声念起文件,“瓦西里奇科夫·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身高1米78,体重72公斤……”

“您呢……叫什么名字?”母亲突然低声道。

“您是说真名还是人前的名字?”他警惕地问。

“我不明白。”柳芭坦率地说。

“波利尼西亚的原始部落……”镶假牙的男人说,“……习惯取两个名字。一个是真名,埋藏在心底深处。另一个是人前的名字。就像演员的艺名。可以在任何角落呼叫。”

“难不成这里是波利尼西亚?”

“这里是尤里耶夫。”镶假牙的男人坦白地说,“但是印第安人大概乘坐香蕉木做的小船顺着科洛克沙河来到了这里。”

“这里有印第安人。”母亲翕动嘴唇说。

“不错。取化名的习惯从波利尼西亚传到了我们这里。比如说党内代号或者小偷的绰号。为的是把命运之神搞糊涂,迷惑上帝。不过这已经属于哲学范畴了,您不会明白的。那么,完事了,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对,”母亲哑着声音说,“我是玛丽亚·伊万诺夫娜。那您是谁?”

“一般来说,我叫谢雷伊,”镶假牙的男人坦白地说,“这是人前的名字。”

“那秘密的呢,有真名吗?”

“有。”

“是什么?”

“谢雷伊。”

“恐怕我记不住。整整两个名字。”母

亲老实地低声说。

“我们走吧。”镶假牙的男人说道,从她手里拿过记录了她失踪儿子的资料的纸。

内城的石屋

……他仔仔细细地用锤子敲着每一块石头、每一块砖。母亲站在一旁,博物馆的两个女工作人员紧挨着站在远处。

“好像有人呼吸的声音,”他突然嘀咕道,将耳朵贴在墙上,“或者只是错觉?”

母亲惊恐地将脸贴到冰凉的石头上。

“大概是暖气过水的声音。”瘸腿姑娘猜测。

“大概是,”镶假牙的男人表示同意,“但是如果有暖气,为什么这里这么冷?”

“因为是俄罗斯。”瘸腿姑娘说。

“也就是说,不能确定是暖气走水。但是,这世上有什么事是确定的呢?……不过这已经属于哲学范畴了。”

“可以确定的是,您在胡扯。”母亲嘶哑的声音说。

“我不是胡扯。我在查案……得了。我们去巴格拉季昂展厅……”

他舒了口气,将锤子放进外套口袋,走到走廊上。

博物馆展厅

侦探在轿式马车旁惊奇地停了一会儿,聚精会神地盯着彩绘的假人。

“巴格拉季昂本人在哪里?”他好奇地问。

“巴格拉季昂埋在锡姆。离这里30公里。”瘸腿的姑娘解释道,“确切地说,是曾经埋在。在他的尸体没有运到莫斯

科去之前。”

“为什么要把他运走?”母亲低声说。

“我听说,那里埋的根本不是巴格拉季昂。”镶假牙的男人说。

“那是谁?”

“这已经是神秘论的东西了。您不会明白的……嗯,坐到马车上。我们看看里面能不能藏住人。”

母亲坐到蜡人旁边。

“不行,”他嘀咕道,“能被发现。除非把灯关了?嗯,把灯关一下!”

瘸腿姑娘按下开关,四周伸手不见五指。

“什么都看不见。”镶假牙的男人在黑暗中嚷嚷道,“柳芭,您在哪儿?”

博物馆的走廊

房顶上有一个窟窿。镶假牙的男人若有所思地向上看,研究着这个窟窿。用手摸了一把石砌的墙,又将手掌抬到眼前……手上蹭到了什么红色的东西。

“有血。”他说。

一个粉刷工从房顶的窟窿里探出脏兮兮的头。

“是红油漆。”粉刷工说。

“你为什么往别人身上洒?!”镶假牙的男人大怒,手掌往墙上一抹,墙上留下了五个指印。

钟楼的楼梯间

“让我们从逻辑上分析一下。”侦探坐到钟楼旁的条椅上,说道,“您认出瓦列克不是您不见了的人,对吧?”

母亲点点头。

“城里的太平间这两天并没有新到的尸体。您来做一个逻辑推断。”

“如果从逻辑上分析,我现在不应该

在尤里耶夫,而是在伦敦。”

“如果从逻辑上分析,我现在应该在穆罗姆,而不是和您在一起。我本来计划从今天开始休假。”

“去他的逻辑!”她叫了起来,“我儿子不见了!儿——子!您到底明不明白?!”

他甚至往后闪了一下,因为已经习惯了母亲细若蚊蝇地说话,这一下却突然声若洪钟——虽然事实上并不像洪钟,而是费力的、嘶哑的声音。

“喔,已经好多了,”侦探说,“尤有余力。不然我老以为自己的耳朵给堵上了。”

母亲没有回答。

“那么,我们要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一下。黑格尔辩证法。正题、反题、合题……正题:人活着。反题:好像从未存在一般消失了。合题:他还活着,只是我们的眼睛看不见他。

“真是愚蠢。”母亲说(她的声音变洪亮了),“难不成他是隐形人?”

“不过是要找到他藏身的地方。这种地方在尤里耶夫能有几处?”

“‘酒馆’?”母亲冷笑着说。

“不是‘酒馆’。比如说……”突然,镶假牙的人闭上了嘴巴。“什么?”他自言自语道,“非常有可能!”

他没有解释,从兜里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修道院接待室?我是区内务处的谢尔盖耶夫……我想找阿尔谢尼神父。对,对……非常重要……我等着……”他静静地等着转接。“我是谢尔盖耶夫,”他继续对着话筒说,“对不起,打扰了……我

们有一个人不见了。莫斯科来的。对。年轻小伙……就当是胡说吧,我想请问一下……您那儿有什么新来的修行者吗?”侦探停下来,听话筒里的解释。

“关修行者什么事?”母亲问。

“我只是……瞎想的……”他没有回答母亲,对着话筒说,“有?!”他的声音一颤,“能见见他吗?!那我们现在过去!”

他挂断电话。

“就当是胡说……”他对母亲说,“情况相符。”

母亲捂着胸口,往后仰靠在椅背上。

“安德烈·瓦西里耶夫。莫斯科来的。前天去的修道院。他们怎么称呼来着?见习修士还是修行者……总之,我不喜欢牧师。牧师应该坐而论道。可他们总想揽权……”

他没有说完,因为母亲已经从椅子上跳起来,向内城的大铁门跑去。

内城前

她哧地按了一下车锁遥控器,上车。汽车画了半个圈。母亲狂乱地将方向盘向右打,朝内城相反的方向驶,这时她才想起,不知道该往哪儿开。

“步行才五分钟。”镶假牙的男人说着,咚地一声坐到副驾驶座上。

“我们已经上车了,”母亲提醒道,“往哪儿走?”

“直走,”侦探精确地说明,“然后再直走,不过靠左边一点儿……”

汽车伴随着刹车片的尖叫声驶离原地。

修道院前的广场

他们来到了另一座钟楼旁,不过这座比内城里的那座更加破烂。



钟楼旁边坐落着两层楼的男子修道院。

“……我不喜欢这里，不喜欢……”  
侦探继续嘀咕着，“我一到修道院就犯晕，浑身不舒服……只是为了您……”

她充耳不闻，从上方立着庄严的耶稣圣像的正门口飞奔而入。

修道院的走廊和修士居室

走廊堆满了建筑用材，脚底下是踩脏了的报纸。

一个身穿黑色长袍的男子敲了敲其中一扇门。

“安德烈教友，有人找你……”

转了一下门把手，门没有锁。

“上帝啊！请保佑我！……”母亲虔诚而激动地画了一个十字，迈过门槛……

“是他吗？”侦探问。

母亲点点头，眼里进出了泪花。

“我不妨碍你们了。”穿长袍的男子鞠了一躬，走出修士居室。

安德烈坐在一张小桌旁读《新约》。听见人声，他一震，从书上挪开目光，站起来……修士居室里有些昏暗，只有一束细长的光从窗外照射在小桌上。

“瓦西里奇科夫·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镶假牙的男人说。

“是我。”安德柳沙回答。

“我说了吧！”谢尔盖耶夫激动地对柳芭叫道，“正题，反题，合题！你真是好样的，小伙子！怎么可以这样让妈妈着急呢？为什么要偷偷摸摸地这么做？对你来说亲人就一文不值……”

“不偷偷摸摸地还能怎么样？”安德柳沙问，“上修道院……难道还要敲锣打鼓地欢送吗？”

“好吧，我无权评判你，”镶假牙的男人挥挥手，“总之，你们亲一亲，拥抱一下……我到走廊去抽根烟……”

他从风衣口袋里掏出一包揉皱的香烟，正准备出去……

“和谁拥抱？”安德柳沙感到不解。

“当然是和她……你妈妈。”

“她不是我妈。”

“什么？！”侦探瞪大了眼睛，“你在胡说什么，乖孩子？”

“他不是安德烈。”母亲噓了口气。

身子一歪，摸到一个扶手的地方，坐到了床上。

“怎么会不是安德烈？……”他将那包香烟彻底揉皱，放回口袋，“怎么，你不是叫安德烈吗？”

“是安德烈。”

“瓦西里奇科夫。”

“不是瓦西里奇科夫，而是瓦西里耶夫。”

“见鬼，还有什么瓦西里耶夫？！”

听见“鬼”这个词，修行者轻轻画了一个十字。

侦探不知所措地看了一眼母亲。

她喘着粗气，摇摇头。

“请原谅……犯了一个小错误……谁没有过呢……小小的技术失误……”  
侦探嘟囔道。

母亲从床上站起来，扶着谢尔盖耶夫的手，出到走廊，小心翼翼地关上身后的门。

“……他身高差不多1米79，穿42码的鞋……难道不是他吗？”

“不是他。”母亲好像回声一样答道。

“真是见鬼！……”谢尔盖耶夫懊恼

地一拳砸在墙上，“主要是名字……还有姓的头几个字母也一样！……就是他，我跟你说吧！”

“怎么，我看上去像疯子吗？”柳芭和声和气地问。

“像。”镶假牙的男人回答。

“哦，谢谢。没想到你会这么说……”她绝望地走在前面。

“等等，听我说……”他试图拽住她的手。

“别碰我！……”母亲大声说，“我受够了……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几个粉刷工人站在木材上好奇地望着他们。

修道院院长接待室

修道院院长办公室的桌子上做好了待客的准备，大大的高脚盘里苹果堆得老高。有一部分墙面蒙上了玻璃纸，以免主人或者客人不小心蹭上刚刚上的白灰。

“……怎么样？”阿尔谢尼神父迫不及待地问。

他的脸颊红扑扑的，性格活泼，身体肥胖，约40岁。头发在脑后梳成一束。蓄着短须，看上去是完全世俗化的，甚至有些时髦。

“不是他。”镶假牙的男人说。

母亲只是叹了一口气。

“嗯，是上帝的旨意。”神父说，“一个朋友把他从莫斯科送到我这儿来的，他说，这个小伙子有点儿古里古怪，学识渊博。你多了解了解他，他说的……我们的大主教可不太喜欢有学问的人。在信仰这个问题上，学问多半会碍事……”

这时，手机铃声突然响了，是音调扭

曲的柴可夫斯基的曲子。修道院院长拿起电话……

“对，是我……对……壁板最少要140米……镶木板已经买了，今天应该运到……”他从桌上拿起一张纸，“还差砖、地毯、瓷砖和澡堂的炉子……对不起，”他挂断电话，“我们说到哪儿了？”

“说到了信仰和学问。”母亲提醒道。

“对，对……”他心不在焉地重复道，“瞧，这儿在翻修。可修给谁……莫斯科怎么样……兴隆吗？”

“应该说，在萎缩。”母亲说，“不过同意这种说法的人不多。”

“壁板……”神父提起前面的话题，脑子里一直在想着自己的事情，“您知不知道什么是壁板？”

“是覆盖墙面的材料，”谢尔盖解释，“现在的有钱人家里都用这个。房子看上去就和画里的一样。而且木头不会腐烂。”

“很好。”神父说，“别人建议我用这个……他说，给院长的房子用壁板。我同意了，虽然我本人更喜欢普通的砌衬材料。”

“对，砌衬，”侦探表示同意，“如果再刷上Pinotex防腐涂料……您知道的，那种丝光般的砖红色，那么……”

“用Pinotex涂料钱可不够……我倒希望就用我们的国产涂料，那样可以省钱……”

“国产涂料绝对不行，”镶假牙的男人斩钉截铁地说，“完全是狗屎。”

“怎么，你用过吗？”

“没用过。我上哪儿用去？又没有自己的房子。我住在宿舍。不过大家都这么

说。”

“也就是说,我选择使用壁板是正确的……”

“当然。”侦探响应道。

母亲则没有吭声。柴可夫斯基的曲子再度响起,不过这次是另一首。如果说前面那首算是《第一钢琴协奏曲》的话,那么现在播放的就是《小天鹅舞曲》。

神父在办公室里团团转,寻找声音的来源。把桌上的书抛开,钻进餐柜里找,探头向桌子底下看……

“是在你身上响。”母亲提醒他。

他哆嗦一下,把手伸到长袍里,又掏出来一个手机。

“是我……什么?没有壁板?那就去科利丘吉诺,那里应该有吧?……如果那儿也没有,那就到亚历山德罗……我付油钱……就这样。”

他挂断电话,漫不经心地看着来访的客人。可以看得出,他想的全是别的事,思绪已经飘到了很远的地方。

“……我们说到哪儿了?”

“说到了信仰。”母亲说。

“在说壁板。”镶假牙的男人纠正。

“对,壁板……没有壁板卖。装修这事简直能让你精神崩溃,信仰动摇……您知不知道,从这里到亚历山德罗有多少公里?”

“到科利丘吉诺 30 公里。过去还有 50 公里……”

“也就是说,一共 80 公里……”院长拿起纸笔开始计算,“他们开的是面包车。往返 160 公里。用的是 80 号汽油。现在 80 号汽油多少钱一升?”

“16 还是 17 卢布,准确的不知道。”

侦探难以回答。

“面包车每百公里耗油 20 升。往返就算 40 升……40 乘以 17 等于……”

“我们走吧,”母亲站起来说,“谢谢您帮忙。”

“好吧,”神父停下手中的计算,说道,“很遗憾,那不是您的孩子。”

“不是我的。”

“恐怕也不是我们的。”院长嘀咕道,“思考和做事都心不在焉的。穿着两只不一样的鞋就跑来了……这算什么事,穿两只不一样的鞋?这个修士可真行,居然穿不一样的鞋……那可不是修士,是稻草人!……”

电话铃声又响了。这一次播放的是《胡桃夹子》。院长看看长袍里面的,桌子上的……不,都不是。是第三部手机在响,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又得满屋子去翻找了。

母亲和侦探踮着脚走出厚重的门。

“我想请问您,”神父突然冲着他们的后背喊,“您愿不愿意到我们的米哈伊洛夫礼拜堂来唱歌?我们唱诗班的人手不够。您不是专业人士嘛……”

母亲没有回答,小心翼翼地关上身后厚重的门。

修道院前面的街道

刮起了阵阵的寒风。冷风在街道上追赶着糖纸,抽打在人脸上,让人提前感觉到了即将来临的冬天。

“瞧他们这些僧侣,”谢尔盖耶夫说,“一会儿修葺,一会儿装修……他们什么时候考虑灵魂的问题呢?”

“谁的灵魂?”母亲心不在焉地问,心里想着别的事。

“比如说,我的?”

“难道您也有灵魂吗?”

“没有。”侦探承认,“您呢?”

“以前有。现在不见了。”

他们在路上看见了一个铁龙头。母亲若有所思地走过去,猛地拧一下开关,龙头里流出了冰凉的水。

放开开关,右脚踢了一下龙头,然后用拳头砸了一下,疼得叫出声来,又狠狠地踢了一脚。

谢雷伊一把搂住她,往汽车上拽。

母亲不知在大喊大叫着什么,浑身颤抖。

将她拖到“标致”车旁,谢雷伊从她包里掏出车钥匙。

“能开车吗?”

母亲摇摇头。于是侦探自己打开车门,坐到驾驶座……

“我们走不走?”

柳芭跌坐在副驾驶座上。

“我把车开到警局,”他说,“在那儿不会有人动它。”

发动马达,慢慢地将车驶离修道院。

“鞋子!”她忽然说道,“不一样的鞋子!”

“什么‘不一样的鞋子’?”

母亲没有解释,也没有回答。

售票员家的院子

门上挂着锁货仓用的锁,看来,女主人不在家。母亲从女主人给她的一大串钥匙中挑出一把打开门,走进住处。

平房的房间

她坐在桌子旁,没有脱下棉袄——它和她相依相偎,几乎变成了她的亲人,没有开灯,愣愣地盯着熄灭的炉子。挂钟

的嘀嗒声很响。远处传来令人厌烦和苦闷的狗吠。

“不一样的鞋子,”她自言自语,“‘不一样的鞋子’和这个有什么关系?”

门口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母亲打了个哆嗦,从自己的思绪中回过神来。这时她才发现忘了拴门。门吱呀一声响,打开了……

门口站着一个个头不高的男人,身穿一件脏兮兮的军装,稀疏蓬乱的头发根根直立。右眼下有一块发黄的瘀斑,海魂衫从军装下露出来,让人想到广阔的大海。

“丹妮卡……你在哪儿,丹妮卡,他妈的?让丹妮卡过来,他妈的……你在哪儿,丹妮卡……”他说起话来噤里啪啦地,又快又凶狠。

母亲感到了极度的恐惧。僵直的双腿站立起来才恍悟,男人已经近在咫尺。

他手里拿着一把白晃晃的芬兰刀,柳芭一眼瞧见,差点儿吓晕了过去。但终究还是勉强说道:

“您想要什么?……我们可以好好说,不用动刀动枪的,对吗?”

“动——刀——动——枪?!……”他掀起下唇,滑稽地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道。

“您想要多少钱?”柳芭重重地嘘了一口气。

下意识告诉她,如果一个人看上去很恐怖,未必会真的杀人。

“120卢布。”男人压低声调用俄语说。

“50卢布。”母亲战战兢兢地说,同时为自己的勇气感到惊奇,“拿了钱,不

许再来了。”

从包里拿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币,递给科里卡。

“好吧。”他说,将纸币缠在刀刃上,再将芬兰刀插进靴筒里。

“行了,走吧。”柳芭冒火地对他说,在他身后插上门闩。

透过窗户,母亲看见尼古拉踏着有力的脚步离去,大概是去附近的商店。

她开始生炉子……

小城的街道

第一场雪在午夜降落,城市变得更加明亮,裹上了盛装,白色的教堂就像镶着镏金顶盖的雪堆。

母亲手里拎着一个装满吃的东西的塑料袋,急匆匆地向警局走去,她的汽车停在那里。

远远看见“标致”汽车,她立刻就发现了难以补救的问题。舒适的小汽车歪向一边,车头顶着柏油马路,就像一只屎壳郎,为了躲避人类的视线,竭力在往土里钻。

跑到跟前,母亲发现,汽车的左前轮被卸走了,右轮吊在一根螺丝杆上晃荡着,小偷不知什么缘故没有来得及把它拧下来。

“竟然有这种事!……”母亲心里想着,跑进了警局。

警局的走廊

“谢尔盖或者其他人在吗?”母亲喊道,只看见了一个女清洁工在用一把脏兮兮的扫把扫地。

“谁也不在,”女工回答,“没人。”

“这些人都去哪里了?”

“在苏兹达利开会。”

“开会!”母亲冷笑起来,“什么人都跑去胡嚼舌头,这里却在发生抢劫案!”

“我也是这么说,”清洁工对她表示支持,“为什么要乱扔垃圾?为什么随地吐痰?而我不得不为你们打扫,对吧?你们在家就不会这样,对吧?”

“对。”母亲说,没等她说完就出去了。

警局前的广场

她就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蹲在被毁的汽车旁。将塑料袋放在地上,双手捂着脸。

一动不动地蹲了一会儿,终究还是勉强站了起来。

拿起塑料袋,向修道院走去。

修道院的走廊和修士居室

“……院长本人同意了?”

“是破例。”

“我们不允许这样。修道院不是约会的地方。”

“我要弄清一个小细节。问明白了我就走。再也不来了,行吗?”

“好吧。既然院长都同意了,那是当然……”

他们走在修道院长长的、空荡荡的走廊上。

塑料袋在她手上晃荡,陪着她的就是前几天带她和谢尔盖到修士居室的穿长袍的男子。

他没有敲门就推开门,自己先走了进去。

“有人找你,安德烈教友……”

自顾自坐在窄床上。

“我和你们坐一坐,不妨碍吧?”

“当然妨碍!”母亲神经质地喊,“怎

么,没有见证者就不行吗?”

“不行,”他淡淡地回答,“不合规矩。”

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巧的祷告书,埋头看了起来。

“您就像在坐牢。”母亲对安德烈说。

“您在外边不也同样像在坐牢?”

她没有回答,从塑料袋里拿出两盒酸奶,一条白面包,黄油,鱼罐头……

“这些是给您的……”

穿长袍的男子视线离开了书,吃惊地看着她拿来的食物。

“为什么?”安德烈不解地问。

“反正也没什么影响。现在又不是斋戒期。”

“见修士时刻都是斋戒期。”

“……上帝保佑,上帝保佑……”穿长袍的见证人嘀咕着,再度埋头读祷告书。

“这个我不能要,”安德柳沙说着,将酸奶推开,“这个也是,”将黄油放回去,“还有罐头……请原谅……谢谢您的面包。”

“好吧。”母亲说,“常言道,无功不受禄。我有一个奇怪的问题想问您……请允许我坐下。”

她从屋角搬来一个小凳,放在屋子中央……

“您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也不要以为我疯了。”

“您说吧。”他着急地催促。

“当然,听起来有点儿俗……您小时候有没有听音乐哭泣的经历?”

说完,母亲缩起脖子,垂下目光。

“有过。”安德烈突然说。

“多大的时候?”

“五六岁……”

“是柴可夫斯基还是拉赫玛尼诺夫?”母亲绝望地喘了一口气。

“不是,”安德柳沙更正,“是爸爸的一张唱片里的民歌——《花楸树》。现在已经买不到了。”

“您……”她艰难地斟酌词句,“从那以后您就爱上了音乐……后来迷上了爵士乐……上了儿童音乐学校……专科学校……”

“奇怪……”安德烈喃喃道。

“就是说,您上过音乐专科学校?!”母亲恐惧地问。

“上过。只是我迷上的是摇滚乐,爵士乐一直不大喜欢。”

“你从音乐学院毕业……”母亲绝望地说完自己的猜想。

一阵短暂的静默。

“‘不要害怕黑夜的恐惧,不要害怕白昼似箭的光阴……’”穿长袍的见证人喃喃念着祷告书。

“我不是音乐学院毕业的,虽然我一直梦想从事音乐职业。我读的是莫大语文系。”

“确实是语文系?”母亲问,仿佛身处迷雾之中。

“应该是……语文系。”安德烈艰难地回答。

“那您为什么来这里?”

“因为一切从这里开始。至少在俄罗斯是。”

“我不明白……不明白……实在有太多相似之处。”

“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他回答,“您



不要胡思乱想。”

“有一个人……”她艰难地说,“有时我甚至觉得,他就是您……就像这样。当您的脸在暗处的时候……”

他其实站在她对面,脸朝着窗户。

“什么人?”

“那家人呢?”她回避了答案,“妈妈知道您来了修道院吗?”

“不知道。”安德柳沙回答。

“行了。不要再说了!”她大声说。

“好的。我不说话了。”

“我已经知道了想知道的。”母亲对穿长袍的男子说,“我们可以走了。”

他从床上站起来,将祷告书放回口袋,打开门……

“走吧。”

“再见。”她对见习修士说。

“慢走。”

“您……您难道不认得我吗?”

安德柳沙迷惘地看着她。他们没有再说什么,走到走廊上。

“他妈妈什么也不可能知道了。”穿长袍的男子说。

“为什么?”

“因为在他二年级的时候她就去世了。”

“明白了。”柳芭沉痛地回答。

宿舍的房间

闹钟指向早晨8点。淡淡的日光透过没有挂帘子的窗户照耀进来。谢尔盖耶夫俯身躺在床上,脸埋在枕头里。

手机铃响了。他没有从枕头上抬起头,在地上摸索到手机,放在耳边。

“对……是我……柳芭吗?……好吧……我说,我会的……”

挂断电话。坐起来,双目无神地注视前方。他头疼。昨天在苏兹达利开完会后一夜宿醉,现在十分难受。他的室友喘了口气,翻个身向右侧卧,脸冲着粉刷过的墙。铁架子床在他身下吱呀作响。

谢尔盖耶夫拿起一瓶已经开瓶的酒,给自己倒了一杯,也不就着吃点儿什么,一饮而尽。然后从窗台上拿来一个三升装的罐子,里面晃荡着一只白色的海蜇——它会在液体里分泌出特殊的酸性物质。半个世纪前,在莫斯科几乎家家都有这样的罐子,但是现在已经绝迹,不流行了。

倒出黄色的液体,同样一饮而尽。皱着脸,耸起肩膀,实在太酸了。从一朵长在陶土罐里的灰溜溜、半枯萎的花上摘下一片花瓣,吃了下去。

所有这些东西在他的胃里混合,产生了必要的治疗效果。

他走到洗脸池边,俯身,鼓足劲。终于径直吐在了洗脸池里。

谢尔盖耶夫洗干净脸,用木梳理一理针立的小平头。现在的他头脑清醒,随时准备继续查案。

内城前的广场

雪开始融化,变成了污浊的稀浆。镶假牙的男人走到母亲身旁——她站在自己被毁的“标致”车旁边,在案发地点等待侦探。

谢尔盖耶夫迅速扫了一眼瘫痪的汽车。

“有备用轮胎吗?”他老练地问。

“没有。”柳芭说。

“好吧,”他叹了口气,想了一会儿,又加上一句,“那我们就走吧。”

当地的市場

市場所有的入口都擠滿了汽車。做生意的人有擺地攤的,有擺在椅子上的,也有擺貨攤的,賣的東西應有盡有:卫浴用品、園藝用具、水果、蔬菜、肉……

謝爾蓋耶夫領着柳芭往前擠,經過一排排攤位,來到最頂頭,靠柵欄的地方坐落着一家不大的露天鞋店。鞋子都是顏色鮮艷的廉價貨。一個長着東方人面孔的攤主站在貨品中央手脚麻利地忙活着。

“又換新鞋了,納吉爾?”謝爾蓋耶夫熱絡地問他。

“怎麼換新鞋了,長官,瞧我穿的什麼?”攤主抬起左腳,腳上的皮鞋鞋底已經脫膠了。

“我不是說腳。我說的是輪子。”偵探說明。

“你是說冬天用的輪胎?”

“就是說它。”

“沒有,”納吉爾說,“還沒有換。沒有時間。”

“你坐牢的時間可是很快就要到了。”謝爾蓋耶夫向他打保票。

“憑什麼,長官?”

“就憑你干的好事。”

“我坐牢……誰給城里人鞋穿?”

“你早就把鞋子賣給了所有人……已經超額完成了任務。”

鑲假牙的男人若有所思地拿起一只像雲母一樣閃閃發亮的皮鞋。

“百分百真皮。”攤主對他說。

“這個呢?”

“這也是百分百真皮的。買吧。我給你打折。”

“反正我沒錢。”偵探嘀咕道,“所以把你的折扣好好收起來吧……走吧,”他對柳芭說,“我都清楚了。”

拉起她的手,領着她出了便門來到最近的馬路上。一輛很脏的貨車緊挨柵欄停着,汽車是外國牌子的,出產國不清楚,因為車頭標明廠家的牌子掉了。

謝爾蓋耶夫環視四周。沒有人注意他。於是偵探從風衣口袋掏出一把多用折刀,拉出錐子,饒有兴致地扎穿了汽車的前輪胎。接着走到另一邊,把那邊的輪子也扎穿了。

汽車警報突然尖叫起來。

“完事了,瑪麗亞·伊萬諾夫娜。”他低聲對柳芭說,“快跑!……”

他們倆飛奔離開了廣場。

河邊

“嗨,謝雷伊,謝雷伊……”母親愁眉苦臉地對他說,“我還以為你是城里的頭號人物。誰知道原來是個小角色……”

他們坐在科洛克沙河岸邊的樹墩上。

“你的汽車是納吉爾的傑作。他早就在干偷輪胎的活兒了。”

“那就抓他呀。”

“我沒有證據,怎麼抓他?”

“沒意思,”母親說,“和你在一起真沒意思,謝雷伊。”

“和你在一起也好不到哪兒去。”他回答。

沉默了一會兒。

“這樣吧,”母親說,“幫我做一件算是違法的事,打听一下那個安德烈的底細。”

“見習修士?”他確認道。

“就是。他是什么人,家庭情况,他母亲以前做什么……”

“为什么?……”

“因为,”她慢吞吞地说,“说不定他母亲就是我。”

“我认为,我们应该休息。”镶假牙的男人嚷嚷道,“去海边。放松一下神经,喝喝矿泉水。”

“谁买单?”

“你。”

“谢谢。不过我哪儿也不去。我要在这里等安德柳沙。”

“不是已经找到他了嘛。”谢尔盖耶夫失去了耐性,“你自己说的!”

“难道你没有过这种经历吗?”她慢吞吞地说,“看见一个不认识的外人,却觉得自己早就已经认识他了,觉得很亲切,喜欢他……你没有经历过吗?”

“有,”他回答,“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母亲颇感意外地看了他一眼。

“别再开玩笑,谢雷伊。干正事吧。”

“我已经记下了所有新近来本城的人……”他说着,拿出一个记事本,“当然,是那些记录在案的。一共有四个:穆霍尔托夫,纳扎连科,穆哈麦多夫,瓦西里科夫……”

“谁?”听到最后一个名字,母亲哆嗦了一下,问道。

“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瓦西里科夫,”侦探慢慢说道,“外号矮子。23岁。被判抢劫罪,情节严重。”

“是刑事犯,对吗?”

“不见得……刑事犯一般都逍遥法

外。”

“瓦西里科夫……”母亲重复道,“有没有可能是瓦西里奇科夫?”

“有可能。”谢雷伊表示同意,“不过我这里记的是:‘瓦西里科夫。’”

“名和父称都相同……”她低声说,“会不会是姓写错了?”

“也许。但这是他第二次服刑——这一点不会错。”

“第一次是为什么?”

“看一下……”镶假牙的男人再次打开记事本,“‘抢劫罪……’”他念道,“‘情节严重。’”

“又是这个!……什么叫‘情节严重’?”母亲失去了耐性。

“天知道!没有给谁行贿,所以量刑重。”

“他在坐牢吗?”

“更糟。在结核病囚犯医院。”

“为什么说‘更糟’?”

“因为那里是毒蛇窝。总之,很黑暗……”

“我儿子小时候曾被怀疑患有结核病……”她若有所思地说。

谢尔盖耶夫绝望地叹了口气。

“可以安排会面吗?”

“为什么?”

她没有回答。只是紧紧地握着他的手。

当地医院的楼梯

谢雷伊在护士长面前打开自己的证件。她眯起近视眼盯着封皮看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

“好吧,我们走……”

他们三人一起爬上栏杆已经残破不

堪的楼梯。

“你们这儿真脏！”母亲看一眼脚下，说道。

“没有人打扫，没有药品，没有医生。”护士长回答，“我一个人干所有的活儿。”

“手术也是您做？”

“做手术的话要送去弗拉基米尔。以前有列奥尼德·彼得罗维奇开刀，现在他的手有些抖了。”

“他以前是一个很好的医生，”谢尔盖耶夫插话说，“给我父亲治过病，割囊肿……可是因为喝酒……”

“我知道。放了苯海拉明的酒。”母亲说，“萨莎·特鲁尼娜配制的。”

“萨莎·特鲁尼娜，”谢雷伊确认，“一个神圣的女人……”

他们上到三层。在楼梯间，一个穿迷彩服的人坐在铁门对面的椅子上睡觉，双手搭在圆滚滚的肚子上。他头顶上挂着一幅手绘油画，画的是麦田。

“弗鲁贝尔。”谢雷伊饶有兴致地问。

“不是。不是断电了。”护士长说，“灯泡烧坏了。”

她从白大褂口袋掏出一块抹布，试图擦干净画上的灰尘。但是，由于抹布本身是脏的，画被弄得更脏了，灰絮纷纷地飘落在正在睡觉的守卫的头上。

他猛地一抖，睁开了眼睛。

“你好，费多雷奇！”谢雷伊热络地和他打招呼，“我们来找你的人。有案子要查。”

“领导知道吗？”费多雷奇关心地问。

“当然啦……他们祝我们马到成功。

快开门吧，大叔。”

“帕子……用帕子捂住嘴巴，妹子，”护士长对柳芭嘟囔道，“以防传染。”

她自己用纱布绷带捂住了嘴巴。

结核病病房

“……给我们吃的！……我们要吃的！拿吃的来！……吃的！要吃的！”

他们用铁饭盆敲打着地面。人数挺多，不少于20人，挤在像文具盒一样狭窄的病房里，窗户上安装了栅栏。他们瘦骨嶙峋、面露倦容、双眼深陷……

“嘘，狗东西！”侦探恼火地嘟囔道，“马上把你们都拉出去枪毙了！”

“他们不给我们吃的，长官。早饭是燕麦稀粥。午饭还是稀粥。”一个双手嶙峋、青筋暴突的年老囚犯解释说，“怎么，现在是1937年吗？”

“还是1938、1939年呢。”谢雷伊说，“如果你们不马上住嘴，我就给你们安排一个斯大林五年计划……”

大家静了下来。母亲从嘴边拿开手帕……脚下的地面有干黄的尿迹。

“闭嘴了，很好。”谢雷伊说，“我本人只有开水当早饭。住的宿舍不比狗窝强。可我也没有对着别人乱吠，狗嘴里流涎。”他歇了一口气，“你们当中有没有一个瓦西里奇科夫·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

“是我。”一个满脸雀斑、淡红褐色头发、身体瘦弱、神色机敏的囚犯从众人中站起来。

“你就是矮子？”侦探问。

“我就是。不过我的姓不是瓦西里奇科夫，而是瓦西里科夫。”

“收拾好东西，你可以走了……”但

是看见其他囚徒喧闹起来，连忙更正，

“开玩笑的。有人想和你谈谈。”他用头朝柳芭点了一下，“从莫斯科来的记者。”

“嗨，为什么？要让我上电视吗？”

“不错。上《人与法》的节目。开始吧。”谢雷伊向柳芭点点头。

“根本不是他。”她低声说。

“那您要找谁？”矮子问。

“我要找儿子。”柳芭说。

“我也是儿子。”

“可惜不是我的。我儿子不见了。”

“他们是密探。”一个囚犯嚷嚷道，“只有密探才会这么干。”

“去你的‘密探’！”谢尔盖耶夫抬高嗓门，“说话之前好好想想！”

“对不起，长官！……它自己脱口而出了。”

“让你这个‘自己’安生坐着，不要胡说八道。”

“您认我当儿子吧，阿姨，”矮子向柳芭提议，“我是好人。”

“谁是你的阿姨？”谢尔盖耶夫打断他，“这位是柳波芙·巴甫洛夫娜。”

“等一下，谢雷伊，不要打断话头。”柳芭制止他，“我想问一下……您是怎么到这儿的？”后一句话她说得很慢，很费力。

“我爸爸把我关进来的……他是远洋船长。”

“您是远洋船长的儿子。”柳芭吃了一惊。

矮子点点头。

“……真是糟糕！”柳芭发自内心地感到吃惊。

“来吧，矮子，给女士讲讲！”众人大

声起哄。

“事情是这样的，”他开始讲，“我老爹到了长崎港。他经常出门，一去就是很久。”

“是出航吧？”谢尔盖耶夫沉着脸问。

“水手就应该说出门。他在那里有情人……一个姑娘。是美女，漂亮极了……鲜艳的嘴唇，红得像猴子屁股。全身都有文身。”

“胸脯呢……胸脯丰满吗？”侦探问。

“关于胸脯我没法说。我没有亲眼见过。总之，她控制着一个毒品交易网。通过我父亲把各种毒品偷运到莫斯科。可卡因、大麻……嗯，你们知道的。”

“你父亲也敢这么做？”柳芭吃惊地说。

“敢。他是远洋船长。从新罗西斯克港口乘坐‘无敌’号。制服上别满了勋章。”

“怪不得……”

“不，他不应该。谁也不应该这么做。只有我爸——他想赚钱，老东西，身上别满了勋章，还想要面包和黄油！”

“噢，真想要啊！”囚徒们大声起哄。

“我对他说：不要用毒品来祸害俄罗斯的青年！”矮子抬高嗓门，“我们是——伊凡·苏萨宁和巴格拉季昂公爵的子民……”

听到后面那个名字，母亲一震。

“我们是伟大的世界性的民族。所有美国佬都应该给我们舔脚底板！可你却来毒害我们……你要是敢毒害我们，我就举报你！……我到卢比扬卡递申请！一直告到帕特鲁舍夫那里……于是他怎么着了，老东西，往我的奔驰车里偷偷

放了半克可卡因，我被汽车检查局的人逮住了。和爸爸的可卡因一起。我亲爱的爸爸。就是这么回事。柳波芙·巴甫洛夫娜！……新罗西斯克港口的‘无敌’号。制服上别满了勋章。在你的节目里讲讲他的故事……”

“那长崎来的姑娘怎么样了？”谢尔盖耶夫问。

“天知道。据说被人干掉了……一个穿燕尾服的先生……”

“好了，我们走！”谢雷伊不由分说抓住柳芭的胳膊，把她往外拉。

“那吃的呢，什么时候给吃的？！”囚徒们大叫起来。

“吃东西——等到共产主义的时候吧。”护士透过纱布绷带对他们说。

“不错，”谢尔盖耶夫表示同意，“而现在还是封建社会早期。”

病房里响起口哨声，一只鞋子朝他们后背飞来。

他们急忙跑出去，仿佛是逃离地狱。楼梯间

“你一个人看管他们不害怕吗？”柳芭问费多雷奇，“他们不会逃跑吗？”

“能跑到哪里去？”谢雷伊反问，“而且，费多雷奇是个英雄人物，会拼死挡住他们的去路……他只怕老婆。”

“我们两个在一起就是力量。”护士长说。

“她就是你老婆？……”侦探不敢相信。

费多雷奇保持沉默。

“你们为什么不给他们东西吃？”柳芭不解地问，“为什么让人挨饿？”

“你别听他们瞎说。我们按规定给他

们吃的。只是他们总嫌少。结核病人的胃口特别大……”护士长叹了口气，想了想，补充道，“有时候我都想往里面浇上煤油，一把火点着……”

“太糟了。”柳芭说，“他们饿坏了。他们又不是狗。”

“狗还强一点儿。”谢尔盖耶夫嘀咕道，“狗至少能在兽医诊所治病。”

“能带东西来转交给他们吗？”

“要领导同意才行。”费多雷奇回答。

“能办到吗，谢雷伊？帮帮忙奔走一下……”母亲请求侦探。

“听着，”他不耐烦地说，“你管什么闲事？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走吧。”母亲挽着侦探的手，和他一起下楼去。

小城的街道

他们来到了售票员丹尼娅的家附近。下起了难得一见的雨夹雪。天色渐黑。看不清路上的行人。

“他爸爸真的是船长吗？”

“应该是水手长。”谢雷伊回答，“矮子因为偷车未遂被捕。偷的也不是奔驰车，而是普通的国产车。他溜上车的时候，主人刚好从家里跑出来。两人打了起来，打得你死我活……简而言之，蹲大牢了。”

“我们都在蹲大牢……”母亲说，“我儿子也是。好了，再见，谢雷伊。”

“做个好梦。”他闷闷不乐地说。

一盏灯孤零零地在灯柱上摇晃，将长长的影子投射在侦探的脸上。他看上去可怜巴巴的。

“要不，进屋里去？”母亲犹豫不决地提议，“喝点儿茶，好不好……”



“听您的，柳波芙·巴甫洛夫娜……随您的便。”他很乐意地同意道。

他们走上门廊，母亲敲了敲门……  
丹尼娅的房子

“我不是一个人。”柳芭对女主人说。

“我们有客人。”

她从沙发椅上跳起来，调低电视的声音。

“是你吗，谢雷伊？”丹尼娅问。

“对。我——是我。你——是你。”

“好极了。茶还没有凉。请坐下，喝茶。”

侦探脱下风衣，坐到桌子旁。

女主人给谢尔盖耶夫倒了一杯茶。

“连环杀手怎么样了？”她兴致勃勃地问，“是不是很让人头疼？”

“不。他们都上电视去了。”他回答。

“那恋童癖呢？”

“以前倒是有一个……”侦探面无表情地回答，“不过还没有变成恋童癖之前就因为肝硬化过世了。”

“这么说来，在我们尤里耶夫没有人犯罪咯？”

“需要吗？”谢尔盖耶夫问，“我可以。”

“你干什么啰啰嗦嗦的，丹尼娅？”母亲不耐烦地说，“没看见人家已经很累了吗……”

“好吧。您坐一坐，在这里吃晚饭。我要去一趟邻居家。我得去找她把温度计拿回来。不然她借去就不还了。”

“她病了吗？”

“早就病了，从小。”

女主人穿上大衣，走了出去。

“他们做自酿酒的时候用温度计测

量酒的温度。”侦探说，“酿酒对温度的控制要求很高。”

“等找到了安德柳沙，这一切对我来说就像是一场梦……”柳芭喃喃道。

“是这样……我早就想对你说……”  
谢雷伊踌躇着，“也许，你永远也找不到他……”

母亲抬眼看侦探……

“你……应该明白。”他抓起她的手，紧紧地握着，“根据官方的统计，每年在俄罗斯有三到四万人失踪。也就是能将一个大体育场挤得水泄不通，明白吗？突然就消失了，明白吗？谁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没有尸体，没留下任何痕迹，没有罪证……你明白吗？四万人……四万！”

血涌上了他的脸庞，他的声音变得嘶哑。看得出来，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他许久。

“四万！什么也没有……像空气一样，空无一物，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他从桌子旁站起来，开始激动地挥舞双手。“这可真是百慕大三角！……他们要航行去百慕大冒险，那就到这里来吧，来科洛克沙河……我真想看看那些无聊的百万富翁，那些大学里的无知小儿，他们驾驶着豪华游艇，一点儿也想不到，一个人会无端失踪——用不着风暴，用不着大自然的肆虐，不需要在大洋或者大海里……就在一座小城里，光天化日之下，没有战争，没有饥荒，没有火山喷发，而是在和平年代……在日常的生活中……到拐角去撒泡尿就再也没有回来！去商店买面包的时候消失无踪。再也找不到了！”

“我儿子一定能找到，”母亲静静地

说,“我相信。”

他中断了自己的独白。古怪地瞧了她一眼,突然吻上她的嘴唇。

母亲甚至连动也没动一下。于是他接着吻她。开始是头发,然后是脸颊、胸脯……

柳芭的房间

谢尔盖耶夫俯卧在床上,静静地睡着。窗外晨曦暗淡。母亲躺在他身旁,饶有兴致地细细端详他背上的文身。用手指摸了一下一个十字形,然后是教堂的圆顶、墙壁的线条……举目远眺的斯大林的肖像……

“什么?是什么?”他一抖,醒了过来。

“你的背上有一座埃尔米塔日美术馆,谢雷伊。”母亲对他耳语道,“怎么来的?”

“怎么来的,”他嘀咕道,“难道你不知道?”

“那么你坐过牢?”母亲吃惊地说。

“现在当上看守了。”他解释。

“还有这种事?”

“就是有这种事。”

“你怎么做到的……从监狱到警局?”

“90年代初,所有警探都干非法勾当。因为发不出工资,没有人工作。于是我们就顶上了他们的位置。”

“那他们——去哪儿了?”

“他们顶上了我们的。现在都在蹲大牢,”谢尔盖耶夫解释,“那些没有被枪毙的。”

他看了一眼手表。

“该干活了,不想去……”

“别忘了说让我去给他们送东西的事。”

谢雷伊下地,开始往上提裤子。

“我给你一个建议,别往心里去。”

“什么事别往心里去?”

“不管什么事。活得轻松一点儿。”

他亲了一下她的脸颊,走出房间。母亲发现,他西装左边袖子的胳膊肘磨穿了。用手抚一抚自己散乱的头发,然后开始慢慢地梳起辫子。



小城的街道

一个背包在她身后晃悠,手里拎着装满食品的塑料袋,每只手各拎两个。

经过内城,她看见自己的汽车又遭了一次劫。现在,“标致”车的两只后轮都被卸走了,只剩下右前轮,样子就像一个正在挨骂的孩子。

但是母亲并没有感到十分不快。她绕着“标致”车走了一圈,哼了一声,摇摇头,继续向前走……

她来到了市医院。

楼梯间和病房

“要是他们想强奸怎么办?”护士长打开沉重的铁门,无聊地问。

“强奸谁？”费多雷奇问。

“恐怕他们不会得到什么乐趣，”母亲说，“尤其是在我身上。”

她和守卫一起走进病房。费多雷奇坐在过道中间的椅子上，用一把短枪对准囚徒们。

20 双饥饿的眼睛盯着他们。

“又是那个记者，”有人嘀咕道，“从莫斯科来的……”

“你还要一直折腾我们吗？”矮子跑到她跟前，大声道，“我们想要吃的，而不是闲扯淡，明白吗？”

“你喊什么？”母亲厉声问，“一点儿都不像远洋船长儿子的样……”

从背上取下背包，拉开……里面装着一大锅还没有凉的烤土豆。

立刻闪开，走到一旁，因为囚犯们已经互相推挤着冲了过来。

这时，母亲从塑料袋里拿出面包开始切，抹上黄油，塞到结核病人手里。

一时之间，病房里静悄悄的。只听见吧嗒的咂嘴声和哼声——饥饿的人们满足地哼着，从病号服上捡起碎屑，塞进嘴里。

“你为什么不吃？”矮子嘴里塞满东西，问道，“吃吧！……”他递给母亲一块烤土豆。

“我不想吃。吃过了。”

“你嫌弃我们？害怕传染？”

她默默地从矮子手上接过土豆，放进嘴里。

“我想问问……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关于那位长崎姑娘的事……”

“什么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他

惊讶地问，“我是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真有你的……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

他笑了起来，他的几个同伴也跟着笑起来。

“我叫矮子，明白吗？”他语带威胁地说，“你说一遍：‘矮子’，‘矮子’……‘你是矮子’……”

“你不就是因为偷车罪坐牢嘛……”母亲没有屈服，“那没什么……实际上，不过是一堆带轮子的废铁——不值一提……但是您把车主怎么样了？”

“没什么。我把他放倒了，但是不严重。”他含含糊糊地解释，“要不是那个木头疙瘩横穿马路，他怎么也不可能追上我。”

“也就是说，是疯子撞上木头疙瘩了……”柳芭试图开个玩笑。

“那个木头疙瘩是傻的。我真是命苦啊。”矮子叹了口气，忽然亲密地耳语道，“我直接撞上了他。我大概是属于那百分之五不能开车的人之一。”

母亲感到一阵恐惧。她觉得，矮子看上去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的安德柳沙……就像在昏暗的房子里，突然打开所有窗户——你看着他，却认不出他。

“百分之五，”母亲重复道，“百分之五……”

她没说完，感到有人在动她脖子上带十字架坠子的金项链。

她一哆嗦，躲开了。

她身后站着一个嘴巴油腻腻的、沾满口水的囚犯。

“你长得不错……”他说，“还不算老呢……瞧那皮肤，光溜溜的。”

“调皮的小娘们，”另一个囚犯说，“既然你心肠那么好，能不能帮我挠挠背？”

“靠到墙上，”她回答，“自己蹭一蹭。”

“你真是不怕死……还挺倔。我就喜欢不怕死的人！”

他突然一把抓住她的裙子，柳芭使劲挣开，裙子顺着线缝开裂了，露出下面黑色的衬裙。

“住手！……”费多雷奇嚷道，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我要开枪了！”

喀嚓将子弹上膛。

他们面前站着吃饱喝足的一群人，正因为吃饱了撑的，想找点儿出格的事做。

母亲将空背包紧紧抱在胸前，一步一步倒退着向门口撤退。

她和守卫一起跑到了走廊上。

丹尼娅的家

柳波芙·巴甫洛夫娜看着镜中的自己。脖子上有一道指甲的抓痕，十字架项链却不见了。

“十字架终究还是被他们偷去了。”她低声道，“不过，也许他们更需要？”

她的心里没有一丝怨恨。

“百分之五……”她低声地自言自语，回想起医院里的谈话。

“你的脸色不太好。”女主人突然出现在背后，看着镜子里的她说。

“因为头发都花白了。”

“头发算不了什么。你的眼睛很年轻。”

“男人总是看头发，而不是眼睛……

我想换个形象。”她冲动地做出决定，不再想刚才的事。“你有染发剂吗？”

“只有这种……”

丹尼娅指指自己泛着红铜色的头发。



“好像还可以……”

“在灯灭了以后……”女主人补充。

“灯泡还没有拧上的时候。”母亲附议道。

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我早就想问你……”柳芭嘟囔说，“为什么你们城里所有的女人……头发都一样？”

“我们商店里有一种染发剂……叫‘知心锈红’。是最便宜的。”

“说不定是假货……”母亲猜想，“纳吉尔专卖水货。”

“我哪里知道？还有一种带点儿绿色的，叫‘微妙混色’，比它更便宜，但是都被抢光了。”

“说不定那个正适合我……”母亲用手指卷起一缕花白的鬓发，“唉……管它呢！……”她下定决心，“就用‘知心锈红’吧……”

从墙角的桶里舀出井水，倒进开水壶，放在炉子上烧。

与此同时，塔季扬娜给了她一瓶褐色的液体。

这时，门口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

“科里卡！”她们异口同声地说。

“不要开门。”柳芭向她建议。

“到底是我的堂兄弟……”女主人提醒道，“万一有什么事呢？”

画了一个十字，走了出去。母亲把盆放在凳子上，将烧开的水倒进去，把“知心锈红”倒进去化开。

刚刚把头伸进溶液里，突然听到外厅传来了声嘶力竭的叫声：

“来——人——啊！杀人了！”

母亲手里拎着开水壶，头发湿淋淋地沾满染发剂，冲了出去。

跑到前厅。科里卡乐呵呵地站在她面前，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将丹尼娅的手反拧在身后，他的堂姐则弯着身子，几乎趴在地上，鼻子顶着门框。

“我们就这宰了她。”他告诉母亲，“该死的！”

然而，话刚到嘴边就停住了，因为柳芭的样子十分恐怖。红褐色、乱糟糟的头发还在滴着水，活像一个巫婆。

“呐！”母亲将开水壶里的水兜头浇在他身上。

他放开丹尼娅的手，抱着烫伤的脸，飞跑出去。

母亲看见他在院子里把头埋进了雪里。

“再让我见到你，我就杀了你。”她平静地说完，关上门。

“你怎么回事……”女主人对她说，

“瞧你都干了些什么，疯子？！……”丹尼娅嘴唇哆嗦着，脸庞因绝望而抽搐，“你把我的堂兄弟……弄残废了！”

“你哭喊什么，叨叨鬼似的？”柳波芙·巴甫洛夫娜不假思索地说。

这个词从哪儿蹦出来的，天知道……

“我什么？……”塔季扬娜呆住了，甚至惊得一屁股坐了下去。

“就是说你。不是我。叨叨鬼。”

“嘿，多谢你了，亲爱的……真是帮了大忙……没想到你会说这样的话。我收留了你，给你床睡，给你容身之地，你反过来骂我？”

“算了。当我没说过。”

“不，不能算了！我兄弟现在成了残废，我还成了叨叨鬼！”

“像得不得了。”母亲确认，“好了。我受够你了。我不需要你的容身之地……明天我就离开……”

毅然决然地走进自己的房间。用毛巾擦干脸，将剩下的‘知心锈红’倒在头发上。

主任医生的办公室

一个面露倦容、背微驼的男人在仔细研究她的护照，将照片和坐在他对面的本人对照。

“不太像……和您的照片。”

“我换了新发型，”母亲告诉她，“昨天晚上刚换的……”

“我不明白。您在我们这里丢了什么东西吗？”

“我在等我儿子。”柳芭说，“有什么不明白的？您需要清洁工，对吗？”

“算是吧。”

“我愿意当你们的清洁工。”

“您知道工资是多少吗？”

“猜得到。”

“一千九。”他缓缓说，“您一个月拿一千九百卢布……就这样有时候还会拖欠工资。”

“我够用了。”母亲说，“园里有白菜，脚下有土豆……还能再给我一份兼职吗？”

“已经找别人了。在您之前。”

母亲无所谓地耸耸肩。

“桶和抹布去找护士长领。工作时间从早8点到下午5点。有问题吗？”

“没有。”

“您可以走了。”他目送她离去，就在母亲快出门时，他突然问道，“顺便问一下，您是不是上过电视？”

“那不是我。”柳波芙·巴甫洛夫娜回答。

医院病房

……柳芭用力一挥将桶里的水泼到地上，迅疾的水流从铁床脚中间冲向墙壁。她穿着裤子，头上系着三角头巾，下面露出红铜色的头发。

病房里的病人不多。一个老头躺在窗户旁不停地呻吟：

“水……我要喝水！”

另一个年轻一点儿的盘腿坐在床上，好奇地注视着新来的清洁工。

柳芭从水龙头接了一杯水递给老头。老头开始大口大口地喝水。

年轻病人见了，将嘴里的嚼烟吐在地板上……

母亲一言不发地用抹布打扫干净。于是年轻人又扔出了空烟盒、糖纸、一团弄脏的棉花……他似乎在考验她的耐性。

柳芭不露声色地将垃圾捡到桶里。

“姑娘，亲爱的……”另一个病人低声说，“给我便壶……”

“在哪里？”柳芭问。

“床底下……”

母亲趴在地上，用扫帚把便壶扒拉出来。然后强抑嫌恶之情，掀开被子，将便盆放在病人身下……

结核病人病房及更衣间

病房中间的过道上躺着一个半裸的人，向右蜷缩成一团，呻吟着。他满身都是鲜血和伤口，脸肿成一团。

柳芭扔掉抹布，慌忙跑到走廊上。

“有人受伤了，费多雷奇！”她朝守卫喊道。

“我不知道。那里没有人。”

“有没有双氧水……或者是碘酒？”

“有绿药水。”

他打开柜子，开始翻找，母亲跟着他从里面扒出几瓶干了的药水，一卷绷带，一个针头弯曲的老式注射器……

结核病人病房

矮子赤裸着躺在铁架子床上。母亲在帮他清洗身上的伤口和抓痕，谢天谢地，伤口并不深，她给他涂上绿药水。不一会儿，矮子浑身涂满了药水，就像某个印第安部落的首领。

“他们为什么这样对你？”柳芭俯身在他耳边问。

矮子蠕动着嘴唇，无声地说了些什么……

“没听明白。”柳芭说，“再说一遍……”

矮子别过脸对着墙。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他？”她站起来，厉声问囚犯们，“就因为我带来的东



西吗?……我人人都给了,为什么要抢,还是嫌少?人人都有,你,你,还有你……”她用手指着一个个剃光的脑袋。“你们还想要什么?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你别给他。”一个年老囚犯说,言下指的是矮子。

“为什么?”

“我们要教训他。”

她看了一眼受伤的矮子。后者点点头。

“听我说,”柳芭失去了耐性,“这里我说了算,给谁不给谁。要是你们敢再动他,就再也别想要吃的。什么也别想要了。只有开水就冷水,吃墙灰。行吗?”

“你够胆量。”有人说道,“别看是莫斯科来的……”

“莫斯科来的,”柳芭滑稽地模仿他说话,“你见过这样的莫斯科人吗?莫斯科人会给你擦痰?”

“你叫什么名字,大胆的人?”那个囚犯问。

她将桶里的水倒在地上,拿起抹布。

“柳夏……”母亲想了想,回答,“叫我柳夏。”

“柳夏,”囚犯撇撇嘴,“天不怕地不怕的柳夏……好不好?”

“好。”母亲说,“我该怕的都已经怕完了。”

将抹布缠在地板刷上,擦完地后接着擦病房肮脏的墙面。

内城的院子

工作一天之后,她在暮色中来到博物馆售票处。此时丹尼娅正在锁门。

“是这样,我……”柳芭嘟囔道,“想向你道歉……请原谅我说你叨叨鬼的

话。我自己也不知道那些话怎么蹦出来的……不由自主脱口而出……”

售票员重重地叹了口气。

“好吧,”她顿了顿,说,“没关系……就当没发生过。”

“我今天就去拿自己的东西。”

“你终于准备离开了?”

“我能去哪里?我的一切都在这里。”柳芭回答。

“那就把东西留下吧……”女主人叹口气,“你就住在我那儿,想住多久住多久……和你在一起我更开心。”

“我也是,”柳芭说,“不会感到忧愁。”

她握握丹尼娅的手,售票员激动地靠在她肩膀上。

“真好,”丹尼娅望着漆黑的天空,说道,“马上到新年了……然后离复活节就不远了……”

“……谁在唱歌?”母亲一震,问,“是天使在唱歌!”

“不是天使。是米哈伊洛夫礼拜堂在排练……”售票员用头朝最近的教堂半掩的门点了一下。

柳芭回过头。金色的灯光从教堂门口照射出来,里面传来了不整齐的女声合唱。

“米哈伊洛夫礼拜堂已交给教会管理……”丹尼娅说,“平时是博物馆,星期天就在这里做礼拜……好了,我们回去喝茶……”

“等等,”母亲回答,“等一下……”

仿佛被施了魔法,她循着声音而去,走进教堂。

米哈伊洛夫礼拜堂的祭坛

唱歌的人站在祭坛一侧的唱诗班席位上,基本上都是女人,穿着平常人的衣服,一共有五个人。她们在排练《天使颂歌》。指挥也是一个女人,但身穿神职人员的服装——长及脚后跟的黑色长裙和头巾。

教堂里很冷,大家嘴里哈出了淡淡的水汽。

“再来一次……”指挥摆摆手说,但是自己却分了神,感觉到有人站在她背后,转过头去。

“您是谁?”看见来访者,她问。

“我没什么用意。听一下。”柳芭对她说。

“教堂关门了。请出去吧!……”

“我不是为这个……我想帮帮您。”

“您以前唱过歌吗?”指挥怀疑地问。

“经常唱。上辈子的时候。”

指挥深表怀疑地从头到脚打量了她一番。

“会唱《天使颂歌》吗?”

“会。您放心,”柳芭试图解除她的疑虑,“我认识你们的院长阿尔谢尼神父,他叫我来帮忙……”

“好吧,”指挥拿定了主意,“到合唱队里去吧。”

母亲站到大家后面……

“从头再来一次!……”

唱诗班歌手开始唱道:

我心描画天使,

圣歌颂唱创造万灵的三一神……

“停!”指挥大声喝道,打断了她们唱歌,“你跑到哪里去了,新来的?唱的是什

么调?”

“听不清声音。”柳芭试图辩解,“很久没唱歌了。闲得太久……”

“你得用心听。用耳朵。你有没有音乐听觉?”

“我能行。马上……”

“再来一次!……”

指挥挥挥手。

“我心描画天使,”合唱队开始唱,“圣歌颂唱创造万灵的三一神……”

“而今抛开了一切尘世的烦扰,”柳芭随着大家唱,“我们都来称颂万物之主,隐形的天使亦齐唱圣歌颂主。哈利路亚……”

这一次唱对了。歌声像鸟儿一样飞出了教堂,售票员丹尼娅站在院子里满怀惊奇地聆听。

柳芭感到由衷的高兴。那些歌词,尤其是关于不再为日常生活烦扰的部分,那么令人愉悦。

她疲惫的心灵找到了理解与共鸣。

注释:

俄罗斯青年歌唱家。——译注

弗拉季米尔·瓦西里耶维奇·斯塔索夫(1824-1906),俄国艺术评论家。——译注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译注

这里“开车”一词与“买醉”音近。——译注  
米哈伊尔·亚里山大罗维奇·弗鲁贝尔(1856-1910),俄罗斯象征主义画家。——译注

这里的“断电”一词与“弗鲁贝尔”音近,说话者不知道弗鲁贝尔,因而答非所问。——译注

俄联邦安全局总部所在地。——译注

俄联邦安全委员会秘书长。——译注